

历代兵燹

车厩山巅思越王

按史书记载，处在浙东余姚市河姆渡镇的车厩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秣马厉兵之地。在这古藤、野树、茅草掩盖的荒山之颠，一片野景一片废墟，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越王建功立业、复国雪耻的基地之一，并留给后人一个回忆。

在《会稽记》《雍正浙江通志》等史志“车厩山”条下均记载着：“越王勾践于此置厩，停车秣马，遗迹犹存，故曰车厩。”

据《国语》记载，当时越国的疆界：“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诸暨），北至于御儿（今桐乡西南），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龙游县北），广运百里。”当时，在长江以北作战主要靠驷马所拉的战车。越王勾践为了向吴国复仇，就选择车厩作为军事基地，在那里秘密地驯养战马，制造战车，提高越国的军事实力，以便日后消灭吴国。

车厩依山面水，山冈平坦，草木葳蕤，养马有水草，造车有材料。勾践选择车厩作为他的军事基地是很有眼力的。由于复仇意志坚决，训练军队有方，加以正确的攻战策略，经过一番激战，终于灭亡吴国，报了大仇，进而称霸中原。正如清代诗人叶锡凤诗中所说：“越王勾践霸中州，一洗当年石室羞。悔杀夫差请成日，不教江畔牧骅骝。”

在今天的车厩山上尚留有一块平地——寨基坪，据说就是越王操练兵马之地，当地人称它为“越王练兵台”。山下一片广阔的地盘，人们叫它“越仙番”，据说乃越王屯兵驻军处。后人还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越王殿，其遗迹至今犹存。现在的车厩山已是满坡荒草野树，要想攀登还得经过一番“披荆斩棘”的搏斗。登上山顶的寨基坪即可看到，山之北麓是一长溜平整的杭甬高速公路，公路的北面又紧靠碧波滔滔的姚江。从寨基坪上俯瞰浩荡东去的姚江，就能在视觉上感受到姚江不可小觑的气势。虽然在目前，绝少有人到此游观或思古，但这里确实仍有着叫人不得不追忆的

气氛，有着使人冥想的价值。

寨基坪在车厩山的山巅，是一个东北朝西南走向，长达120余米、宽40余米的长方形平台。凡是山顶，一般均有突露的山岩，而这里是一片平整，绝无突露的山石，想来是被越王手下的战士们开平了。平台的东北端，有一高土堆，据称为点将台，是当年训练士卒时做指挥之用。现在，整个平台上长满了金刚子、狗窝头草及许多不知道名称的杂树野草，有的已经非常高大苍老，洋溢着原始荒蛮的氛围。看来这在历史上有着极大名气，越王停车置厩、秣马练兵之处，已被世人所遗忘了。面对荒芜的越王台遗址，无不让人心中油然而起无穷凄凉之感慨。

对于春秋时期吴越争战之史事，后汉时人袁康、吴平写的《越绝书》和赵晔写的《吴越春秋》，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言之详矣，读书人一翻即知。然而，越兴吴亡的历史教训，仍然引人深深思考。当吴王夫差把越国打败之后，自认为不可一世了，就过起荒淫享乐的太平日子。然而越王勾践，这位让世人追思几千年的勾践，本是越国的君主，但同时又是战败后被吴国俘获的囚犯。他到车厩山来秣马厉兵时仅仅是一个被吴王宽大释放、回国反省的罪犯。他回到越国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复国兴军，报仇雪耻。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写：“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折狱破械，返国修德。付军政于范蠡，付国政于文种。如此一来，举国同心，同仇敌忾。越王确实树起了报仇的大决心，所以才会如此。对此，《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写得更明白：“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作为一位掌权君主，能够做到这样，确非易事。

据说越国大夫文种，曾出了9条计策，越王仅用了其中的3条，就把吴国给灭掉了。第一条是尊天事鬼，国不被灾。这一条按现代的科学眼光来

看，未免虚空无实。第二条是送给吴王巧工良材，使吴国大起宫室，以消耗吴国的财力。看来这一着棋应该是起作用的。第三条是考虑到吴王夫差淫而好色，惑乱沉湎，遂献美女西施、郑旦，以乱吴王之心。正是这条美人计，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话还得说回来，此3条计策就算生效，在整个兴越灭吴战争中也只不过是辅助手段罢了，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应该是越王勾践的苦心焦思，与民同劳，使举国振奋，国力增强，同仇敌忾，才得以卒灭吴国。而吴国的那位夫差大王，在胜利之后骄狂自大，再加以偏听那位只会花言巧语、专出馊主意的伯嚭，还把忠肝烈胆的伍子胥给诬杀了，这哪能不败，国哪能不灭。应该说，越王勾践尊信范蠡、文种，乃是越国振兴之始；吴王夫差诛杀伍子胥，此举乃吴国灭亡之始也。

车厩，在历史上还是姚江上一个送往迎来、留宿官员、传递情报的驿站，被称为“车厩驿”。这里亦是浙东的一个战略要地，明代汤和、吴祯讨伐方国珍，就是夜渡曹娥江，出其不意攻拔车厩，遂进入庆元（今宁波）的。

车厩区一地很小，车厩山巅的寨基坪就更小了，但是面对这座杂树丛生的越王台——车厩山巅的寨基坪，总能联想到宏大的古文化背景。一想到这古老的文化背景，仿佛让人们进入这个背景之中，找到了俯瞰现代人的历史高地，得以展开无穷遐思。

孙恩起义与余姚

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分封在浙东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仗着曾扶持安帝即位之功，权势煊赫；更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挂有征虏将军的头衔，父子两人性情暴戾，酷虐害民，纵暴吴会，浙东地区百姓贫苦难熬。正如王羲之在一封写给宰相谢安的信中所言：“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写出了当时浙东各县民生极度困苦的现状。于时于事，民心骚动，亟想铤而走险，推翻司马氏执政集团的残暴统治。

时有琅琊人孙泰，累官至新安太守，知晋代的命运将终，乃阴积军资，收买民心，乘机起事。司马道子诱而杀掉孙泰并其六子。孙恩因叔父孙泰被诛杀，危及其己，遂由琅琊潜逃到东海之滨，聚合百余人，志欲为叔父复仇。隆安三年（399）十月，孙恩乘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领兵出征讨伐桓玄，暂离浙东的时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在海岛上聚众起义，竖起了造反的义旗。

孙恩义军率先攻打浙东郡县，杀掉上虞县令。随后攻打会稽。当时还发生了一则笑话：时有王羲之第二个儿子王凝之担任会稽内史，当孙恩兵临城下时，僚佐请王凝之速做准备。但是，王凝之极端迷信五斗米道，见有兵来攻城，即进入香堂祷拜神道，请先师降临助战。然后出来，对众将领说：“吾已请得先师，答应派鬼兵相助，攻城之叛军将不战而自行破灭矣。”遂毫不准备。后来，孙恩轻易地攻入会稽城，将准备出逃的王凝之抓获，将他全家全部杀死，让他们去见五斗米道的先师爷去了。

于是，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县，一时起兵响应孙恩。旬日之间，孙恩杀死几个郡县的长官。当时，三吴之地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此郡县皆望风奔溃，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都弃城遁逃。孙恩即占有浙东、浙南，队伍发展到

10多万人。

当孙恩义军攻占余姚、上虞之后，为保证义军在海上的往来安全，孙恩曾在余姚西北的临山之西2里的蛇山上结寨屯兵，称之为老寨山，至今，老寨、大寨、小寨的地名依然沿用。由此可知在东晋时，临山所在位置便是军兵争夺的要地。

孙恩据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大封官属，并上表朝廷，揭露会稽王司马道子及世子元显的罪恶，要求诛杀他们。

面对浙东暴乱，吴会八郡一时俱起为乱，旬日之间，义军发展到数十万的严峻局势，朝廷立即派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官军前来镇压。

冬十二月，朝廷下诏命刘牢之为都督吴郡诸军事，逼进浙江。刘牢之引荐刘裕为参军，率军击孙恩军。一次，刘裕率领数十人侦察义军动向，与数千义军相遇，刘裕率军奋力搏杀，义军败退。孙恩听说刘牢之率官军渡过浙江，遂率20多万人的军兵眷眷向东逃跑，将财物子女抛弃于道路，诱使官军抢夺。孙恩由此得以逃脱，重新逃回海岛。刘牢之部将高素率军攻占会稽，将孙恩所封的吴郡太守陆环、吴兴太守丘尪、余姚县令吴兴人沈穆夫。

浙东遭遇暴乱，百姓企望官军到来，当刘牢之率军进入浙东时，却放纵军兵暴掠城乡，士民大为失望。

隆安四年（400）五月，任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以防备孙恩义军。谢琰到任，却不作战备，诸将进劝：“贼在近海，应做防备，以备不测。”谢琰说：“孙恩小贼，败走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敢来，天欲杀之也。”

时隔不久，孙恩义军重出海岛，占浹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谢琰派遣军兵进击。孙恩见官军到来，即退走。官军离开，重回占领，官军失利，义军乘胜追击，义军与官军打起了游击战。义军进攻会稽，谢琰正要吃饭，谢琰说，待灭了贼寇再吃，即跨马出战，结果遭遇失

败，被帐下都督张猛所杀。孙恩转攻临海。朝廷大大惊慌，即派宁朔将军高雅之等率军拒战。冬十一月，宁朔将军高雅之来到余姚。

高雅之即在余姚西北的临山东北3里的汝仇湖边的高阜之处建立大寨、小寨用来驻扎军兵。与孙恩义军遭遇，经过激战，官军败北而逃，败退山阴县，死者十之七八。朝廷即加封司马元显为后将军，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都督扬、徐、荆、广等五郡军兵，合力征讨孙恩义军，这才打退了孙恩。孙恩只好率义兵离开余姚，渡海向北，转战于浙北、苏南地区。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出兵攻句章县。刘牢之派刘裕防守句章，刘裕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把孙恩义军打退，官军乃退还余姚浹口。不久，刘裕又在余姚浦口攻破孙恩的部属张骠一军，孙恩只好退走入海。刘牢之打退孙恩义军之后，率官军胜利归来，屯扎于余姚城区之北的圣龟山，“胜归”“圣龟”同音，自后即将此山改称为胜归山。

余姚北城的北门之外有护城河，河上有桥，据说晋代将军高雅之曾在这里战胜了孙恩，因此叫武胜桥。故此桥下有对联说：“武功怀旧凯旋地，胜迹重新普济人。”时至元末，北城拓建后增建城门，即称作武胜门。

隆安五年（401）三月，孙恩北赴海盐，遭到失败。五月，义军攻陷沪渎城。六月，孙恩率众10余万奄至丹徒，京师（南京）震惊，官军只好紧急宣召军兵防守京师。刘裕率官军倍道兼程，赶赴丹徒，打退孙恩义军。孙恩率军浮海走郁州，宁朔将军高雅之赶到郁州，与战，被孙恩俘获。朝廷即派刘裕讨伐义军，在郁州激战，打败义军。十一月，刘裕追义军至沪渎、海盐，打退义军，俘斩过万，孙恩只好从余姚浹口逃入海岛。至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攻打临海，失败，损失惨重，为不被官军所捕获，遂投身赴海而死。

孙恩义军剩余数千人，众推卢循为主帅。五月，卢循率义军转战东阳、永嘉等浙南地区，进而去广东，攻南海、番禺等地，自称平南将军。后被朝廷招安。

隋唐时期的余姚战事

高智慧 龚厉父子 袁晁 裘甫

四明山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元代文学家戴表元在《大岚山诗》中所说：“七里黄泥红树岗，西风果熟一村香。居人只道山深好，七百年来是战场。”

隋朝开皇十年（590），有高智慧起义兵于浙江，自称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军势甚张。隋朝廷派越国公杨素率官军前来镇压，击破高智慧。高智慧只得潜逃入海。杨素自后追踪，从余姚泛海趋永嘉，高智慧率军抗拒，被杨素击破，俘获数千人。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流散，满目荒凉，凋敝不堪，唐王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与此同时，江淮地区以南，由于没有受到安史之乱的波及，战乱较少，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度成了唐代宗剥削搜刮的主要对象。江南八道成了财赋的重心。宝应元年（762），租庸使元载在江淮地区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百姓积欠的8年租调，择豪吏为县令督办。州县官吏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江淮百姓凡稍有积蓄的，都感到极度恐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江淮百姓忍无可忍，即相聚山泽，与官府相对抗。代宗在位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多达10余起，与余姚相关的有余姚龚厉父子起义，以及台州袁晁起义。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余姚四明鹿亭石潭村人龚厉父子起事，抢劫明州（宁波）的百姓丁口，略余姚之地，占据大岚山，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乾元二年（759）春天，鉴于义军势力兴盛，朝廷即命户部尚书，都统淮南、江南、江西节度使李峘征讨龚厉义军。李峘派遣将军潘景兰征讨，三月二十九日至青烟洞口，与龚厉义军遭遇，发生激战，互有伤亡。龚厉率军转而攻打明州府城，败走，“贼众夺气，不知所守”。义军兵败后，

龚厉父子被官军俘获杀害。四月，龚厉起义被扑灭后，即由文学家独孤及代节度使李峘草就《为江东节度使奉破余姚草贼龚厉捷书表》（载独孤及《毗陵集》卷五）呈送朝廷。

时隔3年，又发生袁晁起义战事。袁晁，为浙东台州（临海）人，本是司鞭背之刑的小吏，因为奉命擒贼未获，畏罪逃亡。宝应元年（762）八月，袁晁在浙东明州翁山县（宁波舟山）聚众起义，一举攻克台州。然后，义军很快攻占浙东诸州县，有义众数万。九月，义军攻占信州（江西上饶），进入江西境内。十月，攻下温州、明州，浙东八州之地基本被袁晁起义军所控制，势力波及浙西，义众发展到20万人左右。袁晁于是建元“宝胜”，势力发展迅速，使唐代宗恐慌万状。唐代宗深知南方的江淮地区为唐代财赋供应的后方基地，如果为袁晁义军所有，朝廷命脉就很难维持，唐代宗即派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率官军征讨。

李光弼令其部将张伯仪和柏良器分别到浙东、浙西出兵进剿袁晁义军，与袁晁战于衢州，又战于宁海县紫溪洞。袁晁义军曾在大岚山与官军李光弼进行过激战。唐代宗又起用前任宰相张镐任抚州（江西抚州）刺史，后又升迁洪州（江西南昌）观察使，屯重兵于上饶，进讨袁晁义军。又令大将军袁恡率领两员裨将李长和王晒曜，率官军征讨袁晁义军。广德元年（763）四月，袁晁义军战败，袁晁被擒。

唐代宗还算得上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帝王，在平息江淮地区农民起义之后，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不得不颁布一些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法令，如改革江淮漕运、减免江淮地区的赋役、安抚百姓等，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百姓负担的减轻，有利于江淮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如唐代宗在《刘晏宣抚诸道诏》中所说：“征赋繁兴，江外（江南）尤剧，庶务征求，未逸小息……农人少而转困，编户流而罕归……朕甚痛焉。……令刘晏往诸道宣抚。应百姓有征科繁重，人口逃亡，及水旱所损，不能支济者，并与本道节度使计会，蠲削（免除赋役）负担安存。”在《恤民敕》中说：“浙江东西，去岁旱损，所出租赋，颇甚艰

辛。复闻遭水，百姓重困，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思宏理道，良用疚怀，今所征收，惟正租庸。其余差役，咸使矜量。……如或有犯，便抑停务，具名弹奏。”浙东袁晁农民起义平息之后，唐代宗任命两位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和第五琦主持改革天下漕运，要求他们既要解决财政危机，又要安抚百姓。史载，刘“晏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袁晁伏诛，免越州今岁田租之半，给复（减免）温、台、明三州一年（租税）”。以此安抚浙东爆发农民起义地区的百姓，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

时隔近百年之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浙东发生裘甫起义。

裘氏起源于公元前400多年的春秋宋国，大夫仇牧为救护国君，被叛臣南宫万搏杀于城门口。其子仇仲逃至卫国，为求避害安康，改姓“裘”。裘仲为中华裘氏第一祖。时至西晋，裘仲第三十二世孙裘睿任晋大司马，晋建兴四年（316），因永嘉之乱，裘睿随晋元帝南渡，南迁至浙江金华隐居。其长子裘尚出任黄门侍郎，东晋义熙三年（407）迁居会稽云门（斗丘，今绍兴平水镇）。400多年后，至唐大中、咸通年间，裘氏后裔有裘甫，出身贫苦农家，早年以买卖私盐为业。大中十三年（859）年底，裘甫率领百余农民起义，攻克象山，屡次战败官军，明州城门昼闭。义军直逼剡县，浙江东道震动。观察使郑祗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勅、副将范居植率领官军300人，联合台州地方守军共同讨伐义军。

唐咸通元年（860）正月初四，裘甫率义军在桐柏观前打败官军，杀掉官军副将范居植，正月十四日，裘甫率义军千余人攻陷剡县，打开仓库，赈济贫民，招募勇士，起义队伍扩大至数千人，越州震恐。二月，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官兵镇压，派将领率新兵500人接战裘甫义军。二月初十，裘甫在剡县西部三溪迎战，设伏于溪南，列阵于溪北，堵塞溪水上游水流。诈败渡过溪水，吸引官军追击，立即决壅水淹官军。官军猝不及防，冲走大半。裘甫乘胜追击，大破官军，声势大振。附近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

伍发展扩大至3万余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聚资粮，造兵器，声震中原。

朝廷知道郑祗德怯懦，怕与义军交兵，撤掉他的观察使职务。遂选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率忠武、义成、淮南三军，替代郑祗德讨伐义军。

咸通元年三月，裘甫分兵出击，掠取衢州、婺州、明州、台州。当时明州的百姓相与语：“贼军入城，妻子皆为菹醢（把人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货财不保。”乃募器械勇士，做好固守城池的准备。三月十九日，裘甫自将万人攻下上虞，城内一片大火。二十三日攻入余姚城，杀掉县丞、县尉。再往东攻破慈溪（现慈城）、奉化、宁海，杀掉各地县令。包围象山县。

时朝廷已派遣浙东观察使王式率领官军入浙。四月，王式率官军来到越州，裘甫开始惶惧，即派使者到西陵渡，假装要求归降朝廷。王式不允许。四月十五日，王式入越州城，义军中将领洪师简、许会能率部属投降官军。王式率官军4000人，加地方守军2000人，自上虞分路直趋奉化，解象山之围。

至五月初二，官军攻破义军，占领宁海。收罗逃散居民7000余人。王式说：“贼军窘迫且逃，若逃跑入海，则难擒获了，即命部属驻守海口，焚毁沿海舟船，用以阻断裘甫的入海逃跑之路。裘甫既失宁海，只好暂时驻守南陈馆，部众尚有万余人。五月二十二日，义军部属再遇官军，败而降。二十九日，官军战于南陈馆，义军再获败绩，越黄罕岭逃走。六月初五，裘甫率部回到剡县。次日，官军合围剡县，双方多次激战，二十一日夜，裘甫率部属众首领20余人离城出降，被官军所擒获。王式在越州城将所获义军众头领杀害，独将裘甫押送入京师。

时有裘甫部将刘从简，乘官军不备，率部众500人突围而出剡县，突走余姚大岚山，据险自守。秋七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大岚山，台州刺史李师望诱惑义军互相斩杀以自赎，刘从简遂被部属所杀，首级被献给官军。

至今的大岚山有大岚岗，又称“走马冈”，因是刘从简率部征战之地

故名；刘从简率部驻扎之山岙称作上马岗；刘从简余部最后败走的地方称下马岗，即是现在的下马村。

咸通元年（860）八月，王式将裘甫押送至京，裘甫被杀于京城的东市口。

现余姚大岚山之北，华盖山之西有裘岙村，为裘氏聚居地，与慈溪裘家村、宁波江北裘市裘姓人，均为奉化裘村后裔。余姚裘岙村是南宋初年由奉化裘氏九世孙迁居于此，随着子孙繁衍，形成的古村落，至今已有880多年的历史。

顾全武攻伐董昌

唐僖宗时期，余姚境内发生多起战事。时因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驻越州）与杭州刺史董昌多年仇杀，战乱不止，百姓苦不堪言。

唐光启二年（886）十月，杭州刺史董昌派部将钱镠攻打越州城。越州刘汉宏部将鲍君福（余姚人）率领部众投降。钱镠攻克越州，然后率军东进屯驻于余姚丰山。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逃到台州，被台州刺史押送给董昌，被董昌杀害。董昌遂移镇越州，自称浙东军府事，封钱镠为杭州刺史。三年春，朝廷迫于事实，只好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十月，已升任威胜军节度使的董昌向朝廷要求封其为越王，昭宗皇帝不予准允，董昌怨恨，说：“朝廷负我，我累年贡献无算，求一越王而不得。”乾宁二年（895）二月，节度使董昌听从妖人惑言，在越州僭位称帝，自称大越罗平国，派遣裨将崔温、李蕙屯兵驻守石城。

时任团练副使钱镠将董昌的反叛行为上报朝廷，由此引起朝廷的极大不满。五月，唐昭宗即下诏削去董昌官爵，另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发兵讨伐董昌。浙东招讨使钱镠即派遣部将顾全武讨伐董昌。

顾全武（866—930），余姚城南径桥湾人，少年时曾出家为僧，故又名顾和尚。以卒伍起家，机警有才略，效力于割据两浙的钱氏政权，南征北伐，屡立战功，常侍钱镠左右。积功升迁，任武勇都知兵马使，成为五代时吴越国武肃王钱镠手下名将。

顾全武率军围攻越州，初战于石城，即斩董昌裨将崔温、李蕙。湖州徐应起兵响应董昌，又被顾全武分兵打败。顾全武屯兵西陵，董昌再遣徐珣、李元宾来据守抵御，仍被顾全武战败，徐珣、李元宾投降。董昌又派遣裨将汤白守石城，并派遣袁邠驻守余姚城。

乾宁三年二月，顾全武率军由西陵直趋石城，与汤白战于石城东，斩

首千余级，只有汤臼孤身逃脱。董昌不敢出兵救援。

乾宁三年三月，顾全武率军和明州刺史黄晟等夹攻余姚，袁邠坚壁防守，不敢出战。董昌派遣将领徐章前来余姚救援袁邠。顾全武率军埋伏于半途，待徐章军兵过半，横出攻击，杀200多人，活捉徐章。四月，袁邠见此局势，只好献出余姚城投降。顾全武即率军围攻越州，兵临城下。五月，董昌令众将出战，遇顾全武辄败。董昌有侄董真，骁勇善战，遇顾全武亦败。董昌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朝廷晋升顾全武为诸军都虞候、东面都知兵马使。五月十四日夜，顾全武急攻越州五云门，城破。十八日，董昌出降。次日，顾全武把董昌及其家人300余口，文武官员百余人用船押送至杭州。

舟行至钱清的小江南，董昌说：“我与钱镠从乡里起兵，我是大将军，现在有何面目去见钱镠。”即乘人不备，投水而死。其余被押解的将领全部被处死。钱镠以顾全武俘杀董昌之功，加检校太保、明州刺史。

光化元年（898），顾全武率师渡过杭州湾，攻破嘉兴城，又率军攻占苏州、无锡、昆山。浙东僭越之事遂平。

顾全武歼灭董昌，有识有度，扩大了钱镠的势力范围。为使钱镠保据两浙，遂发动两浙吏民向朝廷进《万人请愿书》，请以钱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钱镠为镇海、镇东军两镇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封钱镠为越王。顾全武提议为保全两浙，必须与吴国杨行密结盟，缓急有救。钱镠即派顾全武与公子钱元璠同往淮南，结盟而归。

天祐元年（904），钱镠受封吴王，遂兼有吴越两地。后梁太祖即位后，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钱镠之所以获得如此高位，实在离不开顾全武之功劳。凡遇打仗，基本无败绩，可称是个常胜不败的吴越名将。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顾全武疾病突发，不治而亡，年65岁。两年后，长兴三年，吴越王钱镠死，年81岁。

方腊起义经余姚

方腊，睦州青溪人。唐永徽年间，有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叛，自称文佳皇帝，故此地相传有天子基，方腊据此自信极足。当时，吴越之地，困于花石纲之扰，民间致怨。

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利用民怨，遂假托“得天符牒”，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二十九日，方腊义军攻入杭州，各郡县群起响应，东南大振。朝廷急派童贯任江浙等路宣抚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陕西六路蕃、汉兵15万，南下镇压。

宣和三年正月，童贯分兵两路，由王禀、刘镇等分别率领，向杭州和歙州进发，企图在睦州会合。该时方腊率领主力南征，相继攻下婺、衢等州，以及安徽宁国县、广德军。史称义军先后攻下浙、徽、苏南、赣东等地6州52县。

于此期间，义军分部攻占越州，一路数千人至余姚境。余姚县知县汪思温即派顾秀才率所部乡夫凿濠龙泉山后进行防御。义军取道姚江南岸的凤亭乡，欲越南门桥进城。越帅刘鞬率官军百余人于此与义军激战，义军败退。民间即此将南门桥改称为“战场桥”，即现今的最良桥。越帅刘鞬亦因战功拜述古殿直学士。

同期，方腊派遣方七佛领兵北伐，失利，只好退守杭州。二月，宋官军包围杭州城，义军难以坚守，退出杭州。三月初，义军再次进军杭州，没有取胜。四月上旬至中旬，浙南地区重被官军所占有。四月十九日，官军王禀部攻陷青溪县。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洞。宋军会合，包围帮源洞。二十四日，宋军发动总攻。义军腹背受敌，7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丞相方肥等30多人力竭被俘，解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就义。

康王避兵过余姚

两宋之际的建炎三年（1129）年底，宋高宗赵构为避金兵，自杭州经过越州，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达余姚，转赴明州，欲移舟赴温台。金兵破越州，知州李邕降敌。金军分兵攻打余姚。知县李颖士募乡兵数千，遍插旗帜以捍敌，把隘官陈彦助阵，屡获斩金兵首级。金军不知地势，不测乡兵多寡，彷徨不敢进军。经昼夜相峙，金兵稍退。金兵在撤退前，曾将通济桥烧毁。知县李颖士因功得晋升越州通判。

建炎四年正月，金兵攻明州，遭到制置使张俊的反击，金兵失利，连夜退兵屯驻余姚。十五日攻破姚城，焚烧民庐，县令、县丞奔逃。节级周珉乘时仇杀县武尉，屠其家。四月初，金兵退离，县令、县丞回城理事，斩周珉。金兵退还临安后。

建炎四年四月初五，高宗自海道经明州还越州，是日舟至余姚，易小舟，许百官各自先行。是时，高宗登龙泉山，品尝龙泉井之水，甚觉甘美而大为赞赏。十二日，高宗驻蹕越州，登基为帝，第二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派人至余姚汲取龙泉井水，装了十坛运往皇宫。

余姚从事通判黄万河受命简兵，乃招募壮士，防守黄竹浦，屯兵浦口村竹桥以保境内。七子俱有将略，分兵防守古路头、最良桥、泉水等处。

时由越州官民上表乞请，即改越州为绍兴府。不久，又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余姚县隶属两浙东路绍兴府，为望县。自宋都城南迁至绍兴，后再迁临安（杭州），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移，大批皇族、贵官、北方巨族随驾南迁，众多皇族择居姚江两岸，现今的余姚赵氏即是当时卜居余姚的赵宋皇族后裔。同时，王、谢、郑、邵等巨姓亦随驾南渡迁居余姚。皇族贵官迁住余姚，给余姚带来了北方豪族的生活风情、习俗，皇家气派的奢侈享受，反过来又影响了余姚市场消费经济，提升了百姓生活消费水平。

南宋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离开绍兴府，至临安府，将临安作为临时京师。五月，下诏废绍兴府余姚县、上虞县湖田为湖，灌溉民田。原有不少大户盗占湖面（牟山、汝仇、千金、梅梁等湖）为田，征收租税，故下诏还田为湖，以利灌溉。

时隔140多年后，至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兵蜂拥南下。宋将承宣使张世杰率残师退至余姚，难以严格管理部下，军纪散漫，竟然把城隍庙、学宫等焚毁；三月，张世杰败军复至余姚，再次纵军大掠，百姓怨恨。此是后话。

抗倭斗争在余姚

在13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以日本海盗为主，一大批混合型的海寇肆意侵扰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南沿岸一带，流窜残害，烧杀抢掠。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股日本海盗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他们并不局限于海上盗掠，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沿海城市的民生财物。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所谓的“倭寇”，八成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或中国人（以安徽人为多）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消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厉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官方勘合贸易。明嘉靖二年（1523），由于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朝廷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了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海外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年间倭乱的升级。

时有安徽商人王直（或称汪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放海禁，被拒绝后，他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南方人为基础，与日本人等合作走私。在后期倭寇中，王直很为知名，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其中以余姚、慈溪（慈城）两县为祸最厉。

浙江总督胡宗宪、宁绍参将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省祭官杜槐、西门

志士谢志望等先后指挥、参与讨伐倭寇，击退倭寇，或做出牺牲。余姚知县要求沿海各乡组织乡兵，各村设置栅门，巡逻守御，以备不测。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浙江、福建地方官员频频奏报，极言闽浙两省沿海倭寇海盗异常猖獗，百姓深受其害，请求朝廷尽快派员整顿海防，肃清倭乱。七月，嘉靖皇帝即“以朱纨为都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纨任怨任劳，严禁闽浙诸通番勾引。主藏者，凡只橈余艘，一切焚之”。朱纨经调查还发现以余姚谢氏、慈溪柴氏、福建林希元为代表的浙闽官绅与走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他开始实施了对付倭患的内治外防措施。朱纨严为申禁，抓获勾引之人辄以便宜斩之，由是浙闽大姓凡与倭寇勾结者失去了利益，对朱纨大为怨恨。朱纨指挥明军经过大小数十战，将葡萄牙人和倭寇等海盗船赶出浙江海域。倭乱的暂息，损害了闽浙地主豪绅与倭寇坐地分赃的关联利益，招致闽人中致仕官僚的仇恨。地方势力联合朝中权贵，诋诬惑乱，于是，朝中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鏜等弹劾朱纨，说朱纨“擅杀”无辜。嘉靖皇帝要求朱纨停职检查，下令究治朱纨。朱纨服毒自尽。朱纨死后，倭寇复燃，巨魁王直有党羽徐学、毛海峰、徐明山、彭老等，率众数千人，时时出入近海，登陆烧杀抢劫，浙东为之骚动。倭寇头目林碧川、萧显、徐海等占舟山群岛为根据地，四处流劫，又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倭患。在这期间，临山卫成为浙东抗击倭寇的主要战场。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自定海出发沿杭州湾西上，侵扰姚北沿海，时有渔民徐经十等以渔具做武器，与倭寇展开激战，杀伤倭寇主将二人。

由于倭寇大肆侵扰浙东，余姚为害至深。朝廷委派俞大猷为宁绍参将，控扼临山卫及所辖各所防务。俞大猷一到浙东，即遇倭寇攻略。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倭寇登陆，至六月间，倭寇留内地3个月，攻略余姚、慈溪、山阴、会稽、定海、象山，以及杭州湾北岸各县，焚掠殆尽。四月，倭寇乘海舟寻得机会从胜山港登岸，劫掠焚烧第四门。第四门是大

学士谢迁故里，甲第连云。倭寇进入第四门后，把镇上的太傅宅、方伯第、侍郎第、状元第、世恩第、少傅第、光禄第等举火焚烧，内藏的诰命图轴、书画手札、珍籍善本均被抢劫一空，所掠财物捆载装船而去。四月十八日，倭寇烧劫沈师桥，杜槐率众兵合击，倭寇逃至姚北孙家堰（桥头镇），杜家军一路追杀，逐之入海。四月二十日，倭寇攻陷临山卫，大肆抢杀。后有卢镗与俞大猷率军赶来，迎战倭寇，斩首69级，才将这股倭寇击退，收复临山卫。倭寇率败兵往南转略至松阳县，又被俞大猷率兵紧追不舍，将倭寇逼逐海上，焚烧倭船50余艘。俞大猷得胜归军，驻扎临山卫。此期间，俞大猷日夜操练卫军，督率将士修造战船，补筑卫城，使临山卫的实战防御能力大为提高。

是年，有余姚人胡贤，嘉靖十四年武进士，授临山卫镇抚，是年领兵至松江，在攻击倭寇战役中牺牲。

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卢镗为参将，俞大猷为浙直总兵；以李天龙代王忬巡抚浙江，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闽军务。山东布政使翁大立（余姚人）任督粮参政，催给剿倭粮饷，驻住松江，以便调度。八月间，倭寇入余姚、梅川、上林、龙泉等处，焚掠抢劫。九月，抢掠临山卫。十月十五日，倭犯东山头横塘（观海卫境内），被省祭官杜槐击退。倭寇转而攻略观海卫，杜槐率领兵丁直前杀寇，卫所以得保全。十一月，倭寇从健跳千户所登岸，北上分略绍兴府所属各县，临山卫守军协助各军，先后擒斩300余人。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海道副使刘起安委任杜槐领兵防守余姚、慈溪、定海（镇海）三县沿海一带。倭寇占据普陀，俞大猷即率领俞家军自临山卫直趋普陀。登山至半腰，倭寇突发，官军被杀伤300余人，倭寇亦败逃入海。

四月，倭寇犯余姚境，省祭官杜槐率乡兵追击倭寇，杀寇300余人，余姚县城戒严，乡绅提请毁黄山桥、候青桥拦江以阻止倭寇入城。3天后倭寇到来，正遇潮涨，不能渡江。江以南乡兵遥为声势，倭寇惊惧，列兵江北

岸，守城官即召集猎人善射者上城，踞城楼从睥睨（城墙上锯齿形的短墙）发弩，射中一倭首，倭寇抢得尸首逃走。

五月十八日（6月6日），倭寇复犯余姚白沙路，省祭官杜槐率乡兵抵御。“本年五月十八日，倭贼二千、船三十只，登劫余姚白沙。槐率领家兵，黑旗为号，自午至酉，连战一十三合，斩获绯衣大王首级一颗，杀余倭三十四人。少顷，遇倭于两墙夹弄，一倭躲闪石墙角边。槐提刀连石墙斩去，石为之开。与李广之射石没羽者何异。此时，鏖战方酣，用力太猛，不觉腰腹中已为斩倭石墙角时刀柄所损。战罢，始知之。星夜驰归，三鼓过岑家堰，取水饮。岑人进黄瓜食之，惫益甚，亟呼从者曰：‘快回。’去家犹十余里，四鼓一到家而亡。”（《慈溪秦氏宗谱》载《杜将军传》）《明史·杜槐传》载：“副使刘起安委槐守余姚、慈溪、定海。遇倭定海之白沙，一日战十三合，斩三十余人，馘一酋，身被数枪，堕马死。”杜槐由此而力竭战死。

六月，倭寇自观海卫出洋，烧杀抢劫沿海山民财物。

九月，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参将汤克宽并被逮捕入京下狱。巡抚应天都御史周琬为兵部右侍郎兼代总督浙闽军务，御史胡宗宪为浙江巡抚。

十月，倭寇200余人由乐清县歧头登岸，流劫于黄岩、仙居、宁海等地，一路抢劫至慈溪、余姚，所过焚掠殆尽，被杀掳者无数。海道檄余姚方士杜文明偕慈溪县主簿毕清统兵抵抗。杜文明之子即省祭官杜槐刚刚战死，杜文明强忍丧子之痛，与毕清率军赶赴抗倭前线。行至枫树岭，与倭寇遭遇，杜文明与毕清一同战死。各地居民未曾防备，遭遇倭寇焚掠残酷。

闰十一月初一日凌晨，倭寇200来人趁天黑偷袭梁弄斤岭。时由第四门人谢志望督率家兵几百人一路追踪倭寇，于斤岭设伏。倭寇从小路摸上山岭，他们都是善战的亡命之徒，手持长刀，天性剽悍嗜杀。乡兵使用的大都是短兵器，武器大不如倭寇，接战中难以发挥优势，死伤极大。乡兵勇

猛迎战，自卯时（5时至7时）直杀至申时（15时至17时），两军激战10多小时。谢志望亲手杀死倭盗9人、击伤30来人，矢尽力尽，仍奋勇陷阵，最后英勇战死，时年仅28岁。谢志望家兵10多人以及秀才金应旻等均战死。

时当参将卢镗率官军至，追杀倭寇，追赶至梁弄。倭寇见势不利，用计将金银财物抛掷街面，诱使官兵争财。纷乱之中，倭寇到处乱窜，随手放火，大肆掩杀，巷战十分激烈，梁弄成为一片废墟。四更时分（晨1时至3时），倭寇只剩20余人，向西南上虞方向逃窜，渡过曹娥江进入会稽县。余姚秀才胡梦雷与从兄胡应龙等率乡兵穷追倭寇至东关。经过东关激战，胡梦雷、胡应龙、胡操六等百余人也一同战死。倭寇焚掠上虞，后会稽县典史吴成器督率众兵到来，追击倭寇至嵊县，才将倭寇剿灭。事后，分守道许东望把谢志望等英烈事迹上报朝廷，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十五日，明世宗下旨褒奖谢志望等人，追赠谢志望为太仆寺丞，赐祠额“褒忠”，春秋祭祀。并在余姚龙泉山谢文正（太傅谢迁）祠之前建褒忠祠。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总督杨宜被罢免，以胡宗宪为总督，阮鹗任浙江巡抚。四月，千余名倭寇乘东北季风而来，在鸣鹤场登陆；另有8艘倭船载着千余倭寇在临山、三山（浒山）一带登陆，烧杀掳掠。一股倭寇抢掠云楼之乐安湖，捕获一名姓王的秀才为向导，引至余姚西门城下。黎明时分，城门将开启，王秀才即时大呼：“倭寇来了！”守城兵丁急忙关闭城门，列兵拒之，倭寇只好引退而去。王秀才后设法溜走，才没有被害。几天后，两股倭寇合兵一处，攻打观海卫与龙山所，被驻军击溃，于是转攻慈溪县城。

是时，倭寇2万余人，流劫浙江，据载：“时两浙皆被倭，而慈溪焚杀独惨，余姚次之。”遭受倭患惨状以慈溪为最、余姚为次，故此才有了慈溪新建县城和余姚增筑江南城之举。

是年七月，29岁的戚继光由山东登州卫指挥僉事，调任浙江，升任宁绍台参将。宁绍台参将自定海卫移驻临山卫。戚继光见卫所之兵久不习战，赴义乌招募三千新军，训齐部伍，严肃纪律，训练出威名赫赫的“戚

家军”，成为抗倭主力。

此时，鉴于倭寇越演越烈，两浙焚掠惨重，嘉靖皇帝命浙江总督胡宗宪亟急速制定方略，以图进攻。由于该时倭寇自甬江入西，泛舟姚江，焚掠余姚后，沿江烧掠西上，一直抢劫到上虞、绍兴为止，姚江两岸百姓深受其害，各乡震恐。

余姚每当发生寇警，城外百姓避兵入城，至江北城池不能容纳。遂由大学士吕本于嘉靖三十六年疏请朝廷允准增筑江南新城，由浙江总督胡宗宪典领筑城工程，于次年六月竣工。待江南新城筑成后，南北双城挟姚江对峙。自此之后，凡遇倭警，由舜江楼鸣钟报警，两城军民一齐上城并力守护，以舜江楼鼓声为信号，用强弩利箭、火球射向江中倭船，将倭寇杀退。然后，在舜江楼上敲动云板，庆祝胜利。由于余姚南北两城的防御，倭寇无法越过姚城西上，保护了姚城以西姚江两岸直至绍兴等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致再遭受倭寇的侵扰。由于江南新城在抗倭战争中的功绩，即由武英殿大学士徐阶撰写了《余姚县新城记》，碑文赞扬了余姚人民在抗倭斗争中的英雄业绩，由南京礼部尚书孙升撰书、兵部尚书翁大立篆额、浙江总督胡宗宪和余姚知县徐养相立石，竖碑于姚江岸边。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大股倭寇乘秋冬季风而来，再次攻打慈溪龙山所。浙江巡抚阮鄂督率浙直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知府谭纶，带领大军赶赴龙山所增援、围剿，击退倭寇。在此期间，胡宗宪多次带领军兵，巡察各地抗倭情况，驻兵于余姚胜归山麓。事后，余姚士人为胡宗宪塑生像于胜归山，名为“胡公岩”。胡宗宪命俞大猷处理舟山之倭寇，督兵四面围攻舟山。倭寇全部出动，大败而归。官军积薪草以棕蓑燃火投掷，倭寇四处溃散。是役斩首140余级，其余全部焚死，舟山之寇悉平。

胡宗宪设法诱降倭寇头目王直。王直相信胡宗宪，即在舟山向胡宗宪的部将卢镗投降。胡宗宪驰军至定海，将王直带回杭州，打入牢房，不久将王直斩首，自此之后，倭患始息。

十一月，倭寇失去了主要头目，群倭扬帆南去，转而侵掠泉州、福州

等地，各城皆被攻毁。十二月，朝廷会议平倭之功，加赵文华少保；胡宗宪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自此之后，戚继光转战于浙南地区，战功甚伟。

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以功进都督同知衔，代俞大猷任总兵官。明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被执政张居正调至北方，训练边兵，镇守蓟州达16年之久，敌不敢犯，被当国大臣所倚重。进左都督，以功加少保衔。

与临山卫相关的抗倭英雄人物有许多，如俞大猷、卢镛、胡宗宪、杨尚英、刘显、娄宇、吕圻、朱冠、马自进、周粟、耿宗道等，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却是戚继光。戚继光虽然在余姚临山卫时间只有年余，但成为姚北老百姓心中500多年来经久不衰的抗倭英雄形象，流传有极多关于戚继光的传说故事。至今临山镇内尚有“戚少保祠”和教场路、指挥台等遗存。

抗清斗争与余姚首义

清初，余姚抗清斗争震撼东南，热血志士光照史册。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殉国，明代灭亡。四月，清军在吴三桂的引领下进入山海关，五月初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袞进北京城。五月初一，凤阳总督马士英迎立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

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满、汉文化进入全方位的直面交锋和冲突。就整个清初历史来看，顺治时期（1644—1661）是满、汉文化剧烈冲突、明遗民激烈抗争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清代统治者为了压服汉人的反抗，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展开了残酷的军事征服，推行野蛮落后的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凸现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首先，就军事征服而言，早在入关前，满洲贵族就屡次犯边侵掠，每战必事豪夺杀掠。满洲习俗尚武善战，凡战皆以掠夺来激励士卒。其次，与清初的军事征服相伴随，清代统治者推行了严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高压政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日，清政府颁发剃发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在强令剃发的同时，又迫令汉人易服改冠。衣冠发式乃民族的外在形象标志，并内化为民族的心理认同。清廷此举意在从精神上压服汉人的民族意志，其引起的“逆向效应”势必激起汉人的激烈反抗。“头可断，发不可剃”；“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这是当时汉人的普遍心态。此外，为维护满洲贵胄利益，保障八旗兵丁生计，清政府推行圈地令、投充令、逃人法。当时圈占汉民土地而置的旗地官庄遍布近京“七十州县，广袤二千余里”，而且随着满洲八旗驻防的扩展而扩大到山东、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这种农奴制庄园是对汉族土地封建生产关系的反动，势必激起庄园奴仆和投充人的强烈反

抗。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汉族的民怨沸腾，反抗的怒火燃遍中华大地。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五月初九，清军在豫亲王多铎统率下渡过长江。初十，福王出走芜湖，被俘。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六月十日，清政府颁发剃发令。在强令剃发的同时，又迫令汉人易服改冠。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汉族的民怨沸腾，反抗的怒火燃遍中华大地。六月，明潞王降清，杭州失守。

消息传到余姚，余姚知县王曰俞弃官而逃，训导王玄如乘机掌了县印，此人系贪图权势之人，他一面遣衙役前往清营联络投降事宜，一面督令民夫日夜抢修道路，准备迎接清军大营。清军首领随即驰书委任王玄如署理余姚知县之职，并勒令在余姚推行剃发令。对王玄如的丧节行径，余姚民众愤怒不平，纷纷拥至县衙门外聚众抗议，县衙一时被围得水泄不通，王玄如躲在衙内不敢出门。

此时原任九江佥事孙嘉绩正与密友在家中谋略救国之策，获悉县衙被民众所围，认为民心可用，决定即日起事扶明。

这一天是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九，孙嘉绩持剑率家兵赶赴县衙，义民们见孙大人前来，气氛更是高涨。当夜，义民攻入县衙，捉住王玄如。此时王玄如已吓得跪在地上不敢动弹，孙嘉绩大喝一声，当即斩下王玄如首级，并亲擂衙鼓以快民心，在乡进士邵秉节、陈相才，诸生邵应斗、吕章成、沈之泰等纷纷率领各族子弟踊跃相从。不日，姚城聚义者即达数千人，众人公推孙嘉绩为义军盟主。孙嘉绩曰：“举大事将须其人，熊雨殷（熊汝霖字雨殷）有执持，识兵势，当共请其约束。”说罢，即驰书于正在宁波募兵的原吏科给事中熊汝霖回余姚带兵。

闰六月初十，清军任命的宁波知府朱之葵和另一降臣谢三宾的部属为清军输粮，船运粮食途经姚江，被孙嘉绩所率义军阻截，朱之葵弃船逃命。同日，孙嘉绩派人赴鄞县约其学生原明吏科都给事中林时对在宁波府起兵响应。不久，熊汝霖自宁波募兵归姚，义师兵力大增。

孙嘉绩在浙东余姚首举抗清义旗的行动，引发了一场反抗清军残杀汉民政权的民族抵抗运动，浙东各县纷纷举旗响应，闰六月十日，会稽章正宸、郑遵谦（余姚人）在绍兴举旗抗清；闰六月十一日，林时对、董志宁及王家勤、张梦锡、华夏等六诸生在鄞县拥戴原任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抗清；另有原明宁绍台道于颍、苏松兵备佥事沈宸荃、石浦参将张名振、定海总兵王之仁、弘光朝兵部尚书张国维等纷纷在各地举兵响应。慈溪知县王玉藻、定海知县朱懋华、奉化知县顾之俊、鄞县知县袁州佐、象山知县姜圻纷纷提供粮饷，支援义师。不久，浙东地区即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清队伍。

此时，黄宗羲赴绍兴告别老师刘宗周（不食20多日而殉国），回到家乡黄竹浦。获悉熊汝霖、孙嘉绩在余姚首举义旅，驻守钱塘江，即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毁家纾难，驻军于钱塘江，众人称呼为“世忠营”。

浙东抗清复明运动兴起后，孙嘉绩、熊汝霖、张苍水等义军首领与原弘光朝兵部尚书张国维商议，决定迎立明宗室出任监国，当时在浙的明宗室只剩下在台州的明太祖十世孙鲁王朱以海没有降清。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八日，孙嘉绩、张国维等人奉笈迎朱以海出任监国。不久，鲁王自台州至绍兴，就监国位，擢孙嘉绩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视义师；以张国维、朱大典为大学士、督师；晋封总兵方国安、王之仁侯爵。在钱塘江沿岸陈兵200里，与江北清营对峙。浙东一带即掀起了广泛的抗击清军事政权的自卫战争，反抗清军铁骑的残杀政策。

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率义师驻兵瓜里，瓜里位于钱塘江东岸，为钱塘江通海之咽喉。孙、熊义师以瓜里为据点，带兵驰骋于乔司、西兴一带，与清军交锋达数十次，胜败参半。每次作战，孙嘉绩亲冒矢石，躬亲督战，无所畏惧，排阵用兵时常以熊汝霖当先，孙嘉绩殿后，人称“孙熊兵”。但因粮饷短缺，义师兵力遂渐匮乏，军事上也处处受制。孙嘉绩不惜毁家产以佐军，他每对部将泣曰：“身先人馀也，义同国存亡。惟惧事不集，死无面目见君亲耳。”主帅举宗报国的气概，义师官兵无不为之

动容。

弘光朝权奸马士英逃到浙江，突至绍兴，欲见鲁王，九江佥事王思任上疏请斩马士英。马士英愧愤逡巡，十月，马士英途经余姚逃往福建。鲁监国到钱塘江边前线慰劳义军将士，晋封余姚人郑遵谦为伯爵。十二月，方国安兵大败。鲁监国亲祭阵亡将士于江边，遂回绍兴。

顺治三年（1646，鲁王监国元年）元月，总督浙直水师荆本彻与肃靖伯黄斌卿手书塘报来绍，说清军将以千艘战船从海上攻浙。鲁王获报后随即加强了宁绍两郡的兵力，遣于颢率兵驻防三江所，钱肃乐驻防于沥海所，命沈宸荃驻防于观海卫，孙嘉绩驻防于临山卫。二月，江北兵事不断，海上不断有溃退明军渡海南撤。清廷任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部大举入浙，陈兵于杭州湾北岸。孙嘉绩、熊汝霖趁清军扎营未久之际，率义师渡海奇袭清营，击毙清军将领瑚密色于钱塘江上。二月下旬，时有平湖总兵陈梧，上虞人，兵溃嘉兴后，渡海至姚北一带，其部将高鹤鸣等在泗门、临山卫一带大肆抢掠，一时，姚北一带鸡飞狗跳，民愤如炽。余姚县代理知县王正中带兵围击陈梧部。陈梧败退时因慌不择路而马陷泥泽，被蜂拥而至的乡民一阵乱锄痛打丧命。鲁王获悉后，大为震惊，认为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时，斩杀大将为治军大忌，遂欲治罪王正中。孙嘉绩与黄宗羲上疏力保王正中，认为陈梧扰害百姓，胡作非为，王正中为保护地方，剿杀陈梧，并无不当，鲁王见事至如此，也就作罢了。

同月，义军内部因争夺军饷，总兵张国柱抢掠慈溪后至余姚县城，兵围姚城大户。鲁王认为张国柱兵顽难制，欲授以爵位拉拢之。孙嘉绩与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的黄宗羲商议之后，遣余姚县令王正中赴张国柱兵营策反。第二天，张国柱受鲁王所授“胜虏将军”勋位后，果然拔营东去，姚城百姓终于免遭了一场兵革之祸。鲁王加余姚人孙嘉绩、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黄宗羲、王正中率师渡海袭击清军，获小胜。

四月，孙嘉绩遣余姚知县王正中率义师渡海至海盐，破澈浦城，义师士气高涨。五月，鲁王晋孙嘉绩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月，孙嘉绩

将麾下火攻营交由黄宗羲指挥，与王正中等将领合军3000人，准备横渡杭州湾，由海宁攻击清营，不料在江上被清军所阻，兵败而归。此时孙嘉绩所率义师已是损伤过半，几不成军。

时浙东久旱无雨，钱塘江水深已不过马腹。五月二十五日，清军乘机兵分两路渡江南下，一路由马步兵组成，从六和塔、富阳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水师组成，从鳖子门沿海而进。五月二十七日，东西两路清军合力向总兵方国安部署的钱塘江明军出击，主掌兵柄的方国安为固军自保，竟不战而退，兵溃于七条沙，劫持监国鲁王，拔营奔逃。第二天，江上众义军闻讯皆溃。五月二十九日，钱塘江数百里防线拱手让与清兵。清军铁骑势如破竹，踏过钱塘江，直指绍兴。鲁王见大势已去，只好在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的护卫下退出绍兴，由江门出海。六月初一，清军策马渡江，征南大将军博洛率军攻破绍兴，连破台州、宁波等，浙东陷落于清军之手，抗清义军将领官员死伤无数，明军的浙东防线全线瓦解。

方国安劫持监国鲁王至台州，鲁王用密计袭杀守卫者，与大学士张国维等逃至海门。方国安、马士英投降清军。张名振奉鲁王趋舟山希望依附守将黄斌卿。黄斌卿不纳，鲁王只得转赴厦门。马士英被清军总兵赵体元追杀于台州。

清兵下余姚后，火焚孙嘉绩祖父孙如游阁老府。此前，孙嘉绩独子孙延龄已奉母携眷随父航海，家人才幸免于难。

鲁王一行至舟山沿海后，欲进驻舟山，不料，在舟山的总兵肃虏伯黄斌卿以奉福建隆武帝为由，拒绝接纳鲁王进城。鲁王一行走投无路，最后漂泊至附近的一座偏僻小岛上，因粮饷补给断绝，将士们只好以海草、野菜为食。

时正值酷暑，荒岛上闷热难耐，不日即海瘴流行，由于军中缺医少药，岛上军士病死无数。孙嘉绩也不幸积热成疾，疽发于背，全身红肿，10余天后即病入膏肓，顺治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代抗清志士孙嘉绩在舟山附近的荒岛上溘然长逝，年仅42岁。其子孙延龄把父亲遗体掩埋于舟山

芦花岙张信（明初状元）墓南的山丘上（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归葬余姚孙家境）。郑彩奉鲁王入闽后，孙延龄随鲁王辗转于闽南，官金都御史。鲁王驻健跳所，孙延龄升为兵部侍郎。顺治六年十月，鲁王进驻舟山，擢孙延龄为户部尚书，追赠孙嘉绩为太保，谥“忠襄”。

顺治三年十一月，时有永胜伯郑彩（海盗出身）、定波将军周瑞不愿降清，遂带舟师400艘入海，赴舟山奉迎鲁王。十一月二十四日，郑彩奉鲁王到达福建中左所（厦门），后改驻长垣。

顺治四年、鲁王监国二年正月，鲁王誓师于长垣，命熊汝霖集合军队，分路出击。同月，鲁王加熊汝霖为太子太傅，主掌朝政票拟，位居首席；封郑彩为建国公；封周瑞为闽安伯。二月，熊汝霖率兵克海澄，数日后克漳浦，后连克建宁、连江、长乐、永福、闽清等城，击毙清总兵、副将等多人。熊汝霖所率明军一路凯歌，所向披靡，一举收复福建三府一州二十七县，重新建立与清军相抗衡的局面。

同年十一月，清廷大举反攻。此时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部不愿与鲁王联合抗清，鲁王政权已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又因朝中建国公郑彩挟鲁王而擅权，跋扈自雄，暴骄无度。熊汝霖屡次仗义执言，疏责郑彩，郑彩为此恨之入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顺治五年、鲁王监国三年正月，鲁王驻闽安镇，熊汝霖自闽安至琅琦休假。不日，元宵节来临，郑彩听信部属李茂竟的谗言，说熊汝霖欲与郑遵谦合谋告变，遂于正月十七日辰时，郑彩带领同党300余人闯入熊汝霖军营，斩杀侍卫，陡入帐内，绑住熊汝霖及其仅6岁的次子琦官。此时熊汝霖弟熊汝震从附营赶来，大喝道：“谁敢擅杀大臣！”不料，却被埋伏于帐后的李茂用剑投刺倒地，李茂斩落熊汝震首级，掷入海中。随后，熊汝霖及幼子均遭郑彩杀害，尸体被沉入琅琦海中，随行家眷均遭死难。熊汝霖时年51岁。

熊汝霖殉难于琅琦，闻者无不流涕哀恸，义兴侯郑遵谦闻讯后，欲寻郑彩问罪，郑彩遣部将吴辉使计将郑遵谦擒获，郑遵谦自知难逃毒手，乘

兵不备，跳海赴死。此后，郑彩又逼死东阁大学士钱肃乐，凡从绍兴跟随熊、郑起事者，大多惨遭郑彩贼党所害。鲁王获知熊汝霖被害后，辍朝五日，哀痛不已，恸道：“杀忠臣以断股肱，生何益耶！”说着欲跳水寻死，被左右侍臣力阻劝止。一代忠臣、南明砥柱熊汝霖，竟如此枉死于朝中的内讧之中。鲁王却无力惩治擅杀首席的郑彩，一时人心惶惶，军心涣散。清军乘机大举南下，所到之处，明军顿做鸟兽散，闽地城池相继告失，不到半年，鲁王政权在福建一带控制的地盘全部丧失。

正当大批士大夫纷纷屈膝归顺、升官受禄之时。余姚的朱舜水、黄宗羲、黄宗炎、王翊、孙嘉绩、熊汝霖、郑遵谦、吕章成等，以及大批正义之士，均毅然毁家纾难，举义抗清，在东南沿海从事抗清活动，走上了自卫战争的道路，历时15年之久。其中以抗清志士、义帅王翊在四明山建立抗清义寨最为著名。

义帅王翊（1616—1651），字完勋，号笃庵。他自幼喜文爱武，有智略。孙嘉绩、熊汝霖浙东首义后，王翊加入了孙、熊义军，守卫钱塘江防线，鲁王授他职方主事官职。清顺治三年六月，钱塘江防线失守，浙东各州县相继失陷。王翊率余部退入四明山，建立四明山抗清义寨，作为继续抗清的根据地。王翊治军有方，队伍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驻军杜岙、大岚、杖锡等地，破上虞、战奉化，杀清军无数，成为四明山周围各路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王翊因战功卓著，被鲁王政权先后升授河南道御史、兵部侍郎等职。清王朝把王翊义军视为眼中钉，对四明山寨发动了多次围剿，特别是顺治七年八月的一次，集中了优势兵力，军帐蔓延达30里，以团练为向导，进山围攻。王翊数战不胜，率主力退至舟山。清军围攻舟山前，王翊又主动请缨，要求返回四明山，召集残部，作为后援。顺治八年七月，王翊潜入四明山，不幸在北溪被团练捕获，押往定海。途中，他写下了绝命诗，末两句是“平生忠愤血，飞溅降臣辅”。八月十四日，他在定海被清军乱箭射死。这位威震浙东的抗清义军首领死时才36岁。

胜山港俘获英军

清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39—1841），即鸦片战争前后，英帝国主义军队曾3次驾船沿姚江西上，入侵余姚。

道光十九年（1839），在余姚胜山港发生俘获英军事件。

道光十九年四五月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督率文武官员收缴非法走私的鸦片，并在虎门滩上销毁。英国政府随即考虑转移攻击目标。他们首先暗派小艇，到江浙沿海和长江口岸测量水道，以便日后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服务。夏六月，英军20余人驾驶兵船“风鸢号”，自甬东镇海口绕道驶入杭州湾，临近余姚北海岸一带进行海域水道的勘探测绘。在余姚北海的洋面上，西起上虞，东迄观海卫，有沙礁长带，潮涨则没。当英国兵船驶入余姚境北胜山港口边时，兵船即被搁礁。英兵用力摆脱礁石，过不多久，又被沙礁所困。英军人等奋力跋涉，才得以勉强驶近岸边，时已进入黄昏。英军正想憩一口气，偏巧兵船又被泥涂所陷，不得移动一步。黑夜降临，茫茫大海一片昏黑，无法可想，20余人只得龟缩船中，待明日天亮后再做处理。挨至次日早晨，兵船已沉陷泥涂之中，船弦已与泥涂相平。正当此时，有一胜山港渔夫用泥涂小艇载着盐卤经过此地。英军见有渔人载小艇经过，即有两名英军跃入小艇，将渔夫抛落泥涂中，夺得小艇。英军用泥涂小艇往返多次，送20余名英军渡过泥涂，登上胜山港口岸。一上岸，英军即窜入港口附近渔民家中，抢夺食物，强逼渔妇生火做饭，割肉喝酒，狂饮大嚼。

正当英军喝得高兴，忘乎所以的时候，恰好有三山（浒山，原属余姚县）巡检司李凝宇巡视经过这里，见此情况，认为英军所持者火轮巨炮，“今日已失所长，擒之易耳”。遂召集胜山港周围的丁壮渔民与盐民千余人，各人手持锄铲棍棒等，纷纷飞奔到来，包围了英军，准备将全部英国军兵截拿。其中有一个英军，身材魁梧，恃力反抗，即夺过一根丈余长的

巨木，乱舞格斗，有几个渔夫被他击倒。一时间众怒愤激，有更多的人围聚上来，立即将他刺翻在地。经过几个时辰的搏斗，打死了其中一名女酋，然后将其余英军俘获，共计得23人（一说25人）。渔民盐民们即将英军俘虏押解到余姚县衙关押。几天之后，再将英军俘虏转押到宁波府衙，等待上司处置。

宁波府衙经过审讯，发现其中有4名武官：肋治嗒利，29岁，官职较大，系属头目；叫喱，35岁；得吉利是，25岁，英国皇军海军上尉，是“风鸢号”被英军雇用后负责指挥“风鸢号”行动的军方负责人；滑是，29岁，“风鸢号”大副。另外还有晏拿哪布，原是“风鸢号”的船长，“风鸢号”被英军雇用后，晏拿哪布被委任为船上的二把手“副航务长”，“风鸢号”失事时，晏拿哪布船长和他的孩子落海淹毙。夷妇一人，即晏拿哪布的妻子，称之为哪布夫人，26岁，哪布夫人可能是整个鸦片战争时期，被拿获的唯一一位女性俘虏。另有9个夷兵，其余便是该船的水手、雇工杂役等。后来，肋治嗒利在宁波府衙囚禁期间病故。

至于唯一被俘获的这名女夷——哪布夫人，由于当时浙东群众的好奇，在城镇乡村、街头巷尾间大肆宣传，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说她是英国女王的妹妹，以致后来在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说她是英王三公主。到民国年间，这名女夷还上了北京大学的教学讲义《中国近百年史要》（1930）中，称她为“女酋，为英皇第三女也。英将许还侵地，请还女酋”云云（陈怀《中国近百年史要》，中华书局1930年版）。还有更骇人的说法，说哪布夫人就是英国女主，夏燮撰《中西纪事》卷之五中说：“伯麦踞定海数月，闻抚事定，辄听洋艘四出游奕。行至余姚，有土人诱其五桅大船搁浅内滩中，获白夷数人，内夷妇一人，装饰甚盛，有传其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伊里布）闻之，飞檄余姚县设供帐，委员护送入粤。时白夷有善绘事者，上海知县黄冕得其所绘彼国朝仪图以上，则英国女主也！”夏燮还恐读者不信，接着又说：“予亲见其图说，女主之婿日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执女主之手而嗅

之。后见台湾所进图说及西人纪载，皆与此同。”（清同治四年版）

对此事件，浒山人沈贞（1814—1856）著有《半读书屋笔谈》记其事：

北海中有沙礁一带，西起上虞，东迄观海卫，潮涨则没。己亥夏六月，夷舟自甬东绕出悬泥、长墙间，将攻杭、越。夷舟为沙礁所坏，驶近岸，而岸皆陷涂。次早舟已平沉泥中。夷酋登桅求救。适土人载卤过此，跃下，夺一艇内渡，数十人剽食民舍。适三山巡检李凝宇集绅士筹备御策，予曰：“夷所恃者轮舟巨炮，今失其长技，禽之易耳。”遂集渔户、灶丁千余人，围而缚之。其一酋绝有力，魁梧而黄发，取巨木丈余者，舞而格斗，众攒稍刺之毙。其一女酋，余多黑奴，共获二十三人。李上所俘于邑令，囚解宁郡。会裕谦方与夷议和，尽以俘归之，邑人惋惜。

清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定海被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攻陷。道光皇帝获悉定海被英军占领的消息，连连痛骂浙江官员军兵的无能，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人革职查办，叫刘韵珂接任浙江巡抚；授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裕谦代署两江总督，到浙江协力组织反攻。谁知伊里布畏敌如虎，力谋妥协了事。他一面向道光皇帝请求拨款制炮造船，假称加强防务；另一面却向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进行交涉，提出由清廷方面释放关押在宁波府衙的英军俘虏，英军方面撤出定海作为交换条件，以此来缓解浙江战事。

关押宁波府衙的英虏一经移交到钦差大臣伊里布手中，他没有等待上奏道光皇帝批准，擅自制定并实施“释俘还地”之策。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多次折中的结果，终于十月十三日（1840年11月6日）伊里布与乔治·懿律达成浙江停战协议。六天后（11月12日），英国一半兵力调往南粤。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41年2月24日），被余姚胜山港渔民、盐民俘获关押的23名英俘哪布夫人、得吉利是、滑是等，连同原被定海军民所擒获的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等英俘，全数释放送还英军。次日，英军亦撤出定海，驰还广东。余姚胜山港的胜利果实，竟然成了钦差大臣伊里布与入侵英军谈判议和，以达成浙江停战的交换资本。余姚人们获悉如此结果，

深感惋惜之至。

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五日，英寇两艘火轮船、两艘钓钩船、小船数十，由宁波出发往西，沿姚江侵入余姚境。官军望风皆溃。英寇亦不敢驻守，旋即驶回宁波。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多艘英寇火轮船再次沿姚江侵入余姚城，余姚知县彭松年弃城潜逃。英军登岸后大肆焚掠，捣毁城隍庙神像，焚烧岳庙、天后宫、龙泉寺、接待寺；舜江楼被焚，大铜钟被劫去；英寇登上玉皇山，携走宝钟一具；至十四日，英军才退出余姚。

道光二十二年春，官军经余姚，主将率中军从姚江驿赴甬上，别将从海塘出慈溪，水陆并进。山西义勇军、九江兵过县境，由士绅择寺庙宽敞者为将领行帐，提供招待；分派居民屠杀豕鸭，蒸煮米饭，分犒兵士；其余居民闭户避匿，得无扰害。

道光二十三年，与英军战事平解，省府令余姚县丞林朝聘逮捕彭松年，遂由林朝聘署县事，重建被毁建筑。

十八局佃农起义

余姚十八局佃农起义前的浙东形势

入清嘉庆、道光年间之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全国各地反清反帝的革命斗争不断兴起。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这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把斗争锋芒指向腐朽的封建制度。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打地主，就是焚衙门，把官府和地主的钱粮财物分给穷苦百姓。同时太平军实行统一指挥，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从两广出发，转战湖北、湖南，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占领南京，建为国都，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政权。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东南各省农民先后奋起响应。在浙东就有：咸丰二年（1852）奉化农民的抗粮斗争；宁波张潮青、周祥千等领导的争粮价与争盐界的农民斗争；咸丰三年（1853）在镇海、奉化由张金山、洪世贤等领导的响应上海小刀会的武力行动；咸丰八年（1858）鄞县史致芬领导的渔民起义，战斗达6个月，直至史致芬被清按察使段光清诱杀后才息。余姚黄春生领导的十八局佃民起义，也就在这个浪潮中于咸丰八年（1858）开始组织起来。

在各地的武力暴动中，农民和沿海的盐民、渔民是暴动武装的基本队伍，并得到农村手工业劳动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因为大家已经看穿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对清王朝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对太平天国革命则寄托着一定的希望，期待着太平军早日到来。当时余姚曾流传着一首歌谣：“长毛^[注]长毛，不到余姚，不算长毛。你快来，我不跑，跑的是乡绅大店王。”

（注：长毛，因太平军散发不垂辫，农村人民称作“长毛”。）

黄春生和余姚十八局的建立

清咸丰八年、太平天国八年（1858）夏，余姚淫雨成灾，接着又是蝗虫为害，稻谷歉收，农民终岁劳动，自食难饱，可是农民向官衙缴纳的税赋仍不减半毫。地主不但逼租如故，未肯放松，还施加更加恶毒的手段，压迫和榨取佃民血汗。他们一面提出“租鸡钱”“租饭钱”等许多剥削名目，一面又把十六两一斤的秤私制成二十两一斤的大秤，把五斗一斛的构桶私制成六斗一斛的大构桶。照理说，这种不合标准的衡量器是非法的，应予废除。但由于地主与官吏互相依赖、勾结，也就任其使用。所以当时乡间曾有“八脚风车六斗构，农民吃杀老苦头”之谣。农民起来反抗，是理所当然的，余姚北门外黄李鲍村黄春生就是首先组织佃民进行抗租斗争的出色领导者。

黄春生（1811—1861）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家有业田129亩。兄弟3人，长春富，次春贵，春生是老三。黄春生少年时曾为童生，却热爱劳动，犁耙耕耘样样皆精。平时还喜欢和当地青年农民一起习武演艺，锻炼身体，曾因学习拳棒，戳坏了一只眼睛，从此人们称他为“小闯王”。而他自己也以明末农民革命领袖“闯王”李自成为榜样。他性格豪爽，善结劳动群众，好谈国家大事。他眼见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事日非，濒临亡国的危险，对清王朝已怀着一股内心的痛恨，对中国农民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因此面对灾害歉收之年，地主们仍然勾结官府向佃民逼租的残酷行径，黄春生无比义愤，走上了组织佃农进行抗租斗争的道路。他不计自身利害，站在佃农立场上，提出了实行减租和校正租器的主张。

黄春生减租救灾的行动，博得了广大佃农的拥护和赞扬。各乡农民就纷纷集合起来，公推黄春生为领头，联合进城“请愿”。余姚知县崔家荫害怕农民起来造反，先邀城里同黄春生相识的人士在十里亭与黄春生会谈，以缓和局势。再请以黄春生为首的佃民代表进城直接同崔家荫协商，议定这年租谷减为七五折实收。同时告示地主把不合标准的租器——秤、斛集中在“亲民堂”（县衙大堂）当众校正，加盖烙印为记，后人称之为“长毛构桶、长毛秤”，风波才渐趋缓和。

这一场减租谷、校租器的斗争，触犯了地主豪绅们的利益，他们联名向省城控告崔家荫，迫使崔下台。继任知县贾树勋更加狡诈圆滑，凡事听从地主豪绅们的主意。地主们提出：租谷（佃农向地主缴纳）减折，田赋（地主向官府缴纳）也同样要减折。贾树勋为了讨好地主们，即把崔家荫原订协议推翻，任地主下乡逼租。

黄春生获此消息，十分愤慨。他公开声明自己今年不再收租，呼吁各地必须遵守崔知县的减租协议。组织农民进城，直捣南城义井巷史家贾树勋寓宅，向贾树勋问罪。贾树勋潜入县衙，佃农亦紧追至县衙。贾树勋惧于众怒难犯，不得不答允按崔令七五折收租，并张贴布告，佃农始退。

县衙官吏毕竟是地主豪绅的代理人，贾树勋在贴出布告后不久，又出尔反尔，令邓姓地主派遣账房、家丁，随带未经烙印的构桶、风车去黄李鲍村收租，引起双方争执，互不退让。黄春生闻讯赶到，据理力争，严斥邓姓违反协议和布告的行为。账房、家丁溜回城里，扩大事实，谎言构桶、风车被佃农打碎等。邓姓地主就纠合城里的地主豪绅同去县署诉说，贾树勋不辨真相，竟派县差去黄李鲍村出牌拘捕“小闯王”。佃农们义愤填膺，当即会聚起来保护黄春生，抗拒非法拘捕。他们把差役赶跑，把拘捕牌砸碎。

黄春生知道这件事必将引起官府的镇压，就赶紧召集一些农民商议对策。大家认为为了不让地主、官吏任意宰割，必须想出一个对抗的办法来。当时，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天国运动，曾号召各县地主豪绅举办“团练”，黄春生就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各乡农民以庙社为单位，以此名义组织起来，成立“局”，以便进行抗租自卫。这样，全县先后设立了18个局，分布在姚江南北。它们是：黄李鲍局、廊厦局、八堡庙局、丰山局、郑巷局、烂水田周局、太平桥局、吴家板桥局、屯山庙局、菖蒲塘局、乌柏树庙局、宣家塔局、潘巷局、汪蔡局、新墅庙局、姜家渡局、石婆桥局、上虞朱巷村局。各局设有局头，设总局于黄李鲍村石姥山庙，公举黄春生为总局头。各局互相联系，统一调动，一处有事，各局相助。

总局成立后，黄春生发挥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着手组织农民武装。

裁缝潘世忠有智谋，懂阵法，担任军师；艺高胆壮的族弟黄来昌为先锋；拳师陈嗣龙为教练；魏书坤、汪炳育、俞松标、鲍阿水、余子高等为谋士。还设有探情报、联络、采办装备等人员。黄春生的妻子卢七姑和女儿也参加了局。有组织、有领导地同官府、地主相对抗。

十八局农民起事初期，主要是抗租和抗拒官兵的镇压，到后来曾几次进城，择地主豪绅之首恶，焚毁庐舍，搜缴武器，挫其嚣张气焰。后来随着事态发展，就进入革命武装斗争，在太平军未到余姚之前，曾相持达3年之久。以后终于汇集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洪流，成为太平军发展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

十八局农民军三打“成之庄”

姚西第四门恶霸大地主谢敬，号仲逸，因性情急躁，绰号“急土”。有兄弟3人，长嗣端，次嗣壮，即谢敬，三嗣勤。谢敬生性凶横，险恶奸诈。“成之庄”是谢氏家号，专门收租放高利贷的家庭经济机构。谢敬出门骑马，必有家丁随从，招摇过市，横行乡里，乡民敢怒而不敢言。他家里豢养着一批家丁，以黄帛扎头，号称“黄头勇”，作为残酷剥削和逼害乡民的鹰犬，周围群众无不恨之入骨。更有甚者，谢敬还私设公堂，随意把佃户和贫苦百姓捉去，严刑拷打，惨绝人寰。当年一谈起“成之庄”，便会让人毛骨悚然。

咸丰八年（1858）秋，禾稻歉收。为祈求来年的好收成，廊厦八堡庙农民按传统习俗进行迎神赛会。行进途中，正遇谢敬策马奔来，冤家狭路，与赛会人群互相碰撞，引起冲突。谢敬翻落马下，恼羞成怒，竟命家丁抢得塑像逃归“成之庄”。对于作恶多端的谢敬，乡民本来已经是深恶痛绝，今天又是他扰乱了迎神赛会，乡民更是火冒三丈！加上十八局已经形成，可以一呼百应。迎神赛会中，人多势壮，更壮大了大家的胆量，于是，赛会群众联通总局后，就在八堡庙集会，一致要求攻打“成之庄”。第二天，他们就选拔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乡民，手持农具做武器，向“成之庄”庄主谢敬兴师问罪。

谢敬在抢得塑像逃回“成之庄”之后，认为乡民向来是任其欺侮的，

并不畏惧，但怕触犯神灵，祸患难测，心里倒是不安。尤其是其妻杨氏，由于迷信更为担忧。经过计议，还是和为上策。他们一面买通杨氏娘家后杨村人，把塑像偷偷地送回八堡庙，借以缓和局势。一面又令“黄头勇”戒备庄门口，以做防护。当问罪队伍到达第四门时，谢敬的兄长谢嗣端害怕事情闹大，当即出面，打开庄门迎候于庄门前，向农民认罪，表示愿意受罚演戏一台，“标红”^{〔注〕}认罪乞和。经过调停乡民就此罢战。可是时隔不久，奸诈莫测的谢敬，又挑起了事端。

原来八堡庙局头严晋奎，是谢敬的启蒙老师，与谢敬有师生关系。在谢敬向赛会群众演戏标红、认罪乞和过程中，由于“标红”文字经八堡庙会方面的修改后，进一步揭露了谢敬的罪状。谢敬认定是出于严晋奎之手，因此十分恼怒，竟不顾是自己的启蒙老师，乘夜把严晋奎劫持而去。先是利诱，继则威胁，迫严晋奎投降。但严晋奎毫不畏惧，力斥谢敬的不良行径。谢敬几次对严晋奎刁难，但怕激起乡民的更大仇恨，又考虑到严晋奎有副举人身份，不敢下毒手，严晋奎才得免于死。

谢敬私自绑架严晋奎，激起了佃农们的愤恨，因而黄春生力主再次出师第四门，攻打“成之庄”以严惩谢敬。大家也誓为严晋奎报仇雪耻，于是发生了第二次攻打“成之庄”之举。但由于朴素的农民武装事先缺乏周密计划，临阵又没有作战经验，被谢敬预伏在巷口的“黄头勇”所阻击，较多农民受伤，农民队伍被逼退散。

两打“成之庄”的失利，并没有使十八局农民丧失打击谢敬的信心，相反，进一步激怒了群众，他们决定第三次攻打“成之庄”。这一次，大家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经过十八局总局军师、谋士们的计议，认识到同官僚地主武装战斗，既要有勇，又要有谋，不能只凭一时的勇气盲目冒进。于是，他们在探清敌情的基础上，先诱“黄头勇”于第四门镇外，待取得有利形势后，再由几路农民武装奋力会歼。这一次取得了胜利，烧毁了谢氏谷仓。但进一步去攻打“成之庄”庄院时，由于四周筑有高墙，屋宅坚固，门前又有一条护庄河，有“黄头勇”把守，而农民军毕竟不同于正式军队，既无攻坚经验，又缺武器装备，未能攻入。但他们仍不气馁，

以后同谢氏的零星战斗时有发生，互有杀伤。

三打“成之庄”使十八局农民军得到了战斗的锻炼，为余姚的农民武装和地主武装开展进一步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注：“标红”指以红纸写明罪状，张贴于庙前，以做谢神之意。）

十八局农民军两进余姚城

三打“成之庄”之后，十八局农民更加团结起来，一家有事，全局相助；一局有事，十八局共同帮助，大大增加了力量，远非以前那样分散无力了。由此吓得城里地主不敢下乡收租，县里的差役也不敢下乡捕人。时至冬天，而早晚两季租谷未了。因此，地主们就以先解决租事为借口，拒纳田赋。贾知县走投无路，只好央求十八局派人协商解决。黄春生如期进城，至城隍庙赴约会谈。经过协商，议定七折收租。可是当贾树勋见到农民已经开始缴租，又公然毁弃减租诺言，下令限期按旧额逼缴租谷。与此同时，城里的霸头邵元照，又肆无忌惮地把近郊佃农掳去，关进监狱，借此要挟缴租，这自然激起佃农们的极大愤怒。

黄春生看到群情激怒，就立即召集十八局局头商议。为了解救全县农民于痛苦，摧毁官僚地主的统治势力中心，黄春生于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59年1月26日）带领十八局农民军，以农具做武器，冲进县城。那天正是农历过小年、祭祀灶神的日子，守城的团练和衙役毫无准备，十八局农民军直趋南北两城，不敢阻挡。进城后，他们首先打开牢门，释放被关押的无辜农民；焚毁恶霸地主邵元照、史象川（黄春生娘舅）、李树棠3户巨宅，以示惩戒；还从县衙内拖出贾知县进行评理。县衙大堂前是荷花池，奸诈的贾树勋见势不妙，他知道荷花池水浅，淹不死人，为躲避眼前的灾难，就一头跳入池中，假装投水自杀，妄图以“逼死朝廷命官”来加罪于十八局和黄春生。农民军不知荷花池底细，见县官已跳池投水，就收缴了衙役的武器。对商店住宅户毫不惊扰，随即撤离县城。贾树勋被救起后，当然也大病了一场。

这次十八局农民武装进城的暴动事件，轰动了余姚全县，是余姚农民运动史上光荣的一页。黄春生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后果，将会带来官府的报

复，经召集各局头共议，决定建立专门的农民武装，以保卫自己，进一步打击官府和地主的武装。农民武装每至黄昏时分集合在总局石姥山下东庙，或商议大事，或练武习阵法，所谓“小闯王月下点兵”的地方占地约5亩，至今尚有人能够指出这个地方。黄春生自己经常刀马不离身，巡视各局，整顿部署，加强训练，研讨具体计划，大家唯黄春生之命是从。从此，十八局的思想日益统一，组织日益健全，在农村中的威信也日益提高。地方开明士绅魏书坤等也都主动参加了局务活动。他们还同诸暨莲蓬党起义军首领何文庆^[注]取得联系。于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政策和文告不断传来，揭穿了原来官府对太平军的种种造谣诬蔑，广大农民开始向往太平军的到来，造成了农民革命的有利形势。

但是，城里的地主豪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广大农民日益醒悟的情况下，也急忙采取对策，由邵元照出面，向姚北胜山募来壮丁千名，以红帛扎头，号称“红头勇”，助守县城。后来，邵元照为了泄私愤，烧毁十八局成员的院宅进行报复，借此扩张“红头勇”势力，竟于咸丰九年二月十二日出西门袭击离城较近的菖蒲塘局，以解除眼皮下的威胁。菖蒲塘局头徐六耀侦知这一情报，即向总局告急。黄春生采纳军师潘世忠的计策，运用“剪刀阵”战术，分两支队伍，一支从城西渡过姚江，支援徐六耀，拖住“红头勇”；另一支从城东暗渡姚江，再联合东路农民武装，趁“红头勇”与徐六耀的义军在谭家岭激战之际，从东泰门攻入南城。“红头勇”听到县城已被农民军占领，军心慌乱，败退到新西门。攻入南城的农民军，一部分跨越通济桥直扑北城县衙，一部分直插新西门，与徐六耀配合，对“红头勇”进行东西两面夹击，打得“红头勇”溃不成军，有的被杀，有的逃跑，从此销声匿迹。待谢敬的“黄头勇”从第四门赶来县城援救时，十八局农民军已撤出了余姚城。这是农民军第二次进城的胜利。

此讯传到杭州，浙江巡抚胡兴仁即派宁绍台道麟趾来姚查办，撤掉贾树勋的知县，以汤金策接任。并委派候补道胡元博率军来姚帮同镇压十八局。

（注：何文庆，诸暨东乡枫桥前畈村人，因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秘密结党，以锡铸莲叶荷花为记，人称“莲蓬党”，在乡召之可聚5000人。）

十八局总部转移和黄春生的英勇牺牲

十八局农民军的两次进城，使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妄想借助谢敬的“黄头勇”来护卫自己的安全，因此“黄头勇”就进了城。谢敬在麟趾的授意下，大肆招募扩编，人数在千名以上，南北两城均由他们驻防，还经常出城偷袭，气焰十分嚣张。菖蒲塘局头徐六耀考虑到该局离县城太近，为避免敌人的袭击，就带领一批农民武装迁驻梁弄，与宣家塔局的宣士文农民武装（因穿棕发编的袜子，人称乌脚党）合并。

梁弄是四明山北麓的一个盆地，也是余姚县的一处山区集镇，距县城约50里，四周山高岭陡，山路崎岖，地势险要。宣士文生长于梁弄镇之北宣家塔，他的农民武装驻扎在与上虞交界的前方、后陈一带（在今四明湖湖区內）。因此梁弄的地主平日伪装老实，不敢声张。

新任知县汤金策妄图通过对农民军的镇压来显露自己的身手，讨好上司，他暗中勾结上虞县丁宅街地主丁敬义，约定于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日（3月24日），邀请丁敬义的武装团练和谢敬的“黄头勇”同时出动，袭击在梁弄的农民军。宣士文和徐六耀猝不及防，终被突破防线，密林中的局寨亦被隔绝。正当势孤力竭之际，梁弄镇的地主武装又乘机出兵围击，终因寡不敌众，农民军遭到了失败，局头宣士文、徐六耀、严晋奎等不幸被掳。这时，四周农民纷纷赶来营救，欲夺回自己的局头。谢敬见此情势，也颇为惊慌，在来不及把宣士文等押解到县衙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在梁弄镇杀害了。临刑前，宣士文还高呼：“今天我们被你们暗算了，将来天兵到来，绝不会轻饶你们！”表现了为农民运动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十八局农民军对这次受到的损失，都十分惋惜，黄春生立即召开有各局头、谋士参加的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的斗争。众人一致认为太平军进军浙东已为期不远，但黎明之前，敌人的反扑

将会更加疯狂，必须提高警惕，保存有生力量。因此，决定放弃黄李鲍据点，把十八局总部移设到四明山大岚。这样既便于与诸暨何文庆（莲蓬党）、嵊县马阿元（虎啸党）等友军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又有利于在山中耕作，发展生产，积储军粮，解决义军的粮食问题。咸丰十年（1860）春，总局迁到大岚以后，黄春生就发布了一项文告，要求各局抓住春耕时机，努力耕作，不要荒芜一亩田。与此同时，又恢复了原梁弄局宣士文部的活动区域，重新招募佃农入局，加强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在不荒芜农田的原则下，当地农民轮流服役，守望山口要隘。

这时，上虞县朱巷村（距梁弄约20里）也已立局，主动要求归附余姚十八局总部的领导。黄春生与诸暨何文庆、嵊县马阿元也取得了更加密切的配合，山区农民军的声势大振。但县城附近平原地区的农民都备受“黄头勇”的蹂躏，绑架、逼租，民愤日深。黄春生得到这些情报以后，经常派遣小股农民军下山游弋和巡逻，保护和支援平原地区农民的抗租斗争。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860年12月23日），黄春生再次率领部众突袭余姚县城，可是谢敬也乘机率领“黄头勇”冲入山中，对无辜的山民进行搜杀。因此黄春生只得撤离县城，迅速回兵山中，杀退“黄头勇”。

咸丰十一年（1861）春，太平军大规模地向浙东进军。侍王李世贤（李秀成堂弟）率领10万大军，充任进浙的先遣队。二三月间，李世贤部先后在江西婺源景德镇击退清将左宗棠。四月初，由江西玉山转入浙江，先后攻克浙西大部地区，四月十九日（5月28日）占领金华，在金华建立“侍王府”，成为以后太平军在浙江中部和东部的军事指挥中心。同时，太平军陈炳文部、赖文鸿部也攻入浙北，使浙江的形势迅速发展，各地人民积极响应，纷纷起来配合太平军作战。此后，太平军兵锋直指浙东。

太平军的节节胜利，大大鼓舞了十八局农民军的斗志。黄春生为了配合太平军的统一行动，便于五月派人与何文庆相约，决定合力攻夺上虞县城，以扫清从余姚经上虞、嵊县到诸暨的通道，迎接太平军的到来。他命军师潘世忠先攻占梁弄，再攻打上虞丁宅街。不料消息泄露，丁敬义闻讯逃脱。新到任的余姚知县陶云升也大为恐慌，他一面向府衙告急求援，一

面调回被浙江团练大臣邵灿（余姚人）抽调去绍兴守防的谢敬“黄头勇”，并约上虞知县胡尧戴和谢敬的侄儿谢采嶂，各率一部团练，共同围攻在梁弄的十八局农民军。当时，何文庆部因故未到，黄春生带领农民军奋勇激战，击退胡尧戴的官军，乘胜追击至黄竹岭。这时，谢敬率“黄头勇”经八字桥来到农民军背后，陶云升和谢采嶂也率团练军到达梁弄之西，三路武装从背后打击农民军。原已败北的胡尧戴又率官兵返回，对农民军进行四面包围。正当黄春生率众同反动武装激战之际，已经逃跑的丁敬义又带领团练军杀到，农民军面临五路会攻，只得突围而走。突围至后陈箭山时，又被官军武装追上。这时黄春生已身受刀伤，行走艰难。他即令黄来昌和卢七姑再次突围，自己在后掩护，直至部属尽死，黄春生只身难敌，伤重被俘。余姚、上虞两县的官府深恐农民军前来援救，即在后陈地方把黄春生杀害。时为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61年7月19日），年仅41岁。后来，他们还割下黄春生的头带回余姚县城，悬挂在通济桥顶上示众，以此来警告民众。

“小闯王”黄春生的不幸死难，是余姚十八局农民运动的莫大损失。十八局一时群龙失首，领袖无从。地主和官府伪装慈善，想以“只办局头，不问胁从；只要自首，不究既往”的诱降手段来分化农民军。可是十八局农民军洞察其奸，他们在先锋黄来昌、军师潘世忠及卢七姑的带领下，收拾残局，重振旗鼓，继续顽强地战斗着。为保存力量，迎接太平军的到来，农民军分散隐蔽在乡间，暂避锋芒，伺机再起。黄来昌只身远走，翻山越岭到达诸暨，同何文庆共同谋划下一步的斗争。

协同太平军攻克余姚，席卷浙东

咸丰十一年（1861）秋，忠王李秀成率领20万大军从江西进入浙江，八月二十日（9月24日）攻克江山，翌日克常山，八月二十三日（9月27日）侍王李世贤部徐朗等攻占浦江，八月二十六日（9月30日）占义乌。九月二十四日（10月27日），太平军陆顺德部在富阳渡钱塘江，次日克萧山，二十七日（30日）克诸暨，进展神速。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在黄来昌与何文庆率领的莲蓬党的配合下，又攻克绍兴府城，击毙清知府廖

宗元，迫使助守府城的谢敬“黄头勇”从绍兴退至曹娥江，一路溃散，谢敬只好与其兄谢嗣端一起逃往上海。

这时候，李秀成所率谭绍光、陈炳文、童容海等部已包围了杭州。大将黄呈忠、范汝增等部在新昌县铜刀会单木兰起义军的配合下，攻克新昌、嵊县，长驱直进。十月二十一日（11月23日），黄范两将会合何文庆、黄来昌部队进入上虞县城，斩了知县胡尧戴。十月二十四日（26日，或作24日），潜伏的十八局农民军配合太平军和何文庆部攻克余姚城。知县陶云升逃往宁波。恶霸地主邵元照在逃走时被群众截获，投于姚江淹死。黄来昌随太平军入城，号召十八局成员振奋精神，加强组织，共兴革命事业。当时，龙泉山上黄旗招展，四乡农民纷纷进城，呈献粮草酒食慰劳太平军，共庆胜利。

太平军攻克余姚后，编设乡官，户立门牌，新政设施，秩序井然。太平军首领赓天义、阮士珍部就驻守在余姚城。

此后，太平军继续东进。范汝增部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攻占奉化，何文庆等部于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进入慈溪，知县牟温典逃往宁波。十一月初六（12月7日）克镇海。至此，宁波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十一月初八（12月9日），黄呈忠、范汝增部攻克宁波城。清提督陈世章，宁绍台道台张景渠，知府林钧及流亡在宁波的官员躲入江北岸英国领事馆，后乘法国军舰潜逃上海。

与此同时，侍王李世贤部属又先后攻克天台、临海、黄岩。黄呈忠又派张得胜部由奉化入宁海，攻克象山县城。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余姚十八局义军的军师潘世忠和汪炳育率部8000人进驻象山接防。至此，宁、绍、台三府所属各县除舟山外已全部光复。后进驻象山的十八局战士又奉调攻打温州。

这时，忠王李秀成也亲率名将谭绍光等，围攻杭州，并于十一月廿八日（12月29日）攻克杭州城。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布政使麟趾在逃跑中丧命，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候补道胡元博、朱琦等均被击毙。太平军进军浙江势如破竹。自八月二十日（9月24日）攻克江山以来，不到

3个月时间，长驱千余里，克城多座，归附的农民数万人，席卷全浙，取得了重大战果。

外国势力侵犯浙东，太平军西撤

面临太平军在浙江的迅速发展，清王朝十分惊慌。为了挽救败局，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一面加紧围攻南京，迫使李秀成率军回救，以削弱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另一方面出卖中国人民的主权，乞援于英美法等外国军队，引狼入室，散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无耻谰言，对浙东进行疯狂反扑。美国人华尔统率的洋枪队“常胜军”也来到浙东。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地方势力，唆使各地组织“团练”，反抗太平军。当时，在姚北浒山就有坎墩的“白头勇”扼守，姚南大岚山有吴芳林为首的反动民团。潜逃上海的谢敬，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从扬州招募几千难民，也窜回余姚，在马渚、泗门一带进行骚扰。太平军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先后开展了多次英勇顽强的搏斗。但为了避免人民群众的过度损失，太平军终于同治元年四月间（1862年5月）先后撤出镇海、奉化、象山、慈溪等县，浙东的重要商埠宁波也于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撤出，退守余姚。其中奉化、慈溪等县的太平军在撤出以后，曾有再次进退的反复。

黄呈忠、范汝增退守余姚以后，十八局农民军和广大农民密切配合太平军投入战斗。他们在姚江密布河桩，构筑工事，阻止敌船进入。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宁绍台道台张景渠率领“白头勇”拔掉姚江河桩，敌轮随之驶入蜀山渡，二十四日（22日）炮击余姚城，被太平军逐走。太平军乘胜追击“白头勇”至浒山，经过搏斗，消灭了“白头勇”。姚江河桩后由蜀山渡两岸农民帮助修复。五月初四（5月31日），陈世章再攻余姚，又被太平军击退。七月初五（7月31日），华尔的洋枪队也进犯姚城，仍被击退。七月初六（8月1日），马惇和日意格率洋枪队配合清军张景渠部由水陆两路进犯余姚，陆路被太平军击败，但水路敌军乘黑夜拔除姚江木桩，遂使敌轮驶入岳庙港，再次开炮轰城。陆路的敌军也乘势反扑。经过激战，太平军和十八局农民于七月初七（8月2日）忍痛撤出姚城。黄呈忠部退守上虞，范汝增和何文庆退守姚西方桥、马渚一带。

太平军撤离余姚县城之后，知县陶云升和道台张景渠又进了姚城，他们对凡参加十八局的人，大肆进行捕杀。据传被杀十八局农民的头颅是用箩担挑进城的。足见反动统治阶级的穷凶极恶。

当然，反动分子也是决计没有好下场的。“常胜军”头目华尔在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七日（1862年9月20日）的慈溪战役中，由太平军和十八局农民军猛烈还击，被一颗子弹击中而毙命。“常胜军”部属就此撤回上海。那个“黄头勇”的谢敬呢？当十八局农民军闻知谢敬已经回姚，就一致要求剪除这个恶贯满盈的地主恶霸。他们与何文庆部密切配合，由黄来昌率领，于九月十三日（11月4日）围攻马渚“黄头勇”。在激烈的战斗中，谢敬吓慌了，只身躲入添嗣桥一农民家里，被当地农民发觉后报知十八局，活捉了谢敬，绑送到后冯庙社庙。并乘胜直攻第四门，捣毁了谢氏老巢“成之庄”，“黄头勇”溃散。由于谢敬的双手沾满了农民的鲜血，罪大恶极，农民在积愤之下，将谢敬用棉花裹身浇油烧死，名为“点大蜡烛”，实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

此后，十八局战士在黄来昌、潘世忠、倪庆三等带领下，加入了太平军，并随军西撤，转战南北。

黄春生夫人卢七姑，后来被余姚县衙捕获，坚贞不屈，死于狱中。她的遗骨由感戴她的农民私下埋葬在石姥山东麓，立有一块“卢氏之墓”的石碑，以资纪念（此墓碑在公社化运动期间被毁，筑入村前石桥墩下）。太平军和十八局战士西撤以后，余姚农民和全国各地农民一样，仍在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继续顽强地斗争着。

太平军转战余姚

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及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后，人才凋零，到了“朝堂无相佐，战地无将伐”的境地。时由忠王李秀成提议，进军浙江作为基地，以便展开军事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春，太平军大规模地向浙江进军。侍王李世贤率领10万大军，充任这次进浙的先遣队。

是年三月下旬（1861年5月初），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部由赣东回师入浙，连克常山、江山、开化，于四月十九日（5月28日）进据金华，开拓浙西、浙南基地。八月（9月），忠王李秀成部太平军进军浙江，猛攻衢州不克，乃撤围北趋严州。李氏兄弟议议，由忠王李秀成经营浙北，侍王李世贤开辟浙东、浙南基地。李世贤分兵占领宁波府境，亲督大军克复处州（丽水）、台州两府。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9日），李秀成再克杭州。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攻克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底定，唯温、衢两府及定海诸地仍为清军所有。

侍王李世贤（1834—1865），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忠王李秀成的堂弟，太平天国后期名将。咸丰六年（1856）的天京事变，北王韦昌辉屠东王杨秀清，石达开离京出走，太平天国功臣宿将折损殆尽，李世贤“少勇刚强”，即在李秀成的提拔下成了芜湖守将，力保天京粮运。开始受到洪秀全的重用，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李世贤驻军芜湖，在宁国府湾沚镇（属宣城）歼灭清浙江提督邓绍良军，显露了头角。洪秀全设立五军主将制，陈玉成为前军主将，黄文金为中军大佐将，刘官芳为右军主将，李世贤被任命为左军主将，进入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层。咸丰九年十月（1859年11月），李世贤被洪秀全晋封为侍王。咸丰十年（1860），与英王陈玉成等合力消灭清军江南大营，被封为侍王雄千岁，爵称“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攻克宁国，徽州（歙县），与黄文金包围曾国藩于祁门。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底），为解天京（南京）之围，李秀成从天京跑到芜湖，和兄弟商量如何解天京之围。决定采用“围魏救赵”计策——佯攻杭州，吸引江南大营分兵，然后急速回师解围。执行奔袭杭州任务的自然是李秀成和李世贤的部队。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61年3月3日）和十二日（4日），两人三仗连捷，直指重镇湖州。二李决定分兵，李世贤攻打湖州，李秀成从小路突袭杭州。因为杭州是清廷粮赋重地，一旦陷落将严重打击清代财政，所以清廷一定会救援杭州。二月十五日（3月7日），李世贤抵达湖州城外，这也是他第一次到浙江。李秀成包围杭州，从围城到破城，只用了9天，打下了杭州城。江南大营7万人不是在浙江就是在去浙江的路上。李秀成在杭州待了6天后主动撤出。二月二十八日（4月8日），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在建平会合，具体部署分路进援天京。李秀成大军神速返回天京郊外，一举攻破江南大营，杀张国梁，退军到和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包围。

咸丰十一年（1861）春，李世贤部先后在江西婺源景德镇与清将左宗棠激战，失利。三月二十四日（5月3日）由江西玉山转入浙江，长驱直入，摧枯拉朽，先后攻克浙西大部地区。

三月间，浙江巡抚王有龄调谢敬统领常胜军回姚，防堵倪家路海口。四月间，团练大臣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谦调谢敬守绍兴府城。巡抚王有龄写信给谢端接办倪家路海防事宜。协同常胜军饬同民团董事蔡寅生等率军扼守要害。

四月十九日（5月28日），太平军进占金华，在金华建立“侍王府”，金华成为以后太平军在浙江中部和东部的军事指挥中心，李世贤也把这里作为自己在浙江的大本营。同时，太平军陈炳文部、赖文鸿部也攻入浙北。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余姚知县陶云升率领“黄头勇”等5路兵勇，在梁弄地方会剿十八局农民军，俘斩十八局首领黄春生。只有十八局

先锋黄来昌得以突围，后来参加了太平军，协同太平军东征西伐，立下战功。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秋，忠王李秀成率领20万大军从江西进入浙江，李秀成与李世贤联合分兵五路，分别向东、向北出击。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9日），李秀成率部围攻杭州城。李世贤部攻占萧山。十月上旬，太平军将领黄呈忠、范汝增等部在新昌县铜刀会单木兰农民军的配合下，攻克新昌、嵊县，长驱直进。十月二十一日（11月23日），黄范两将会合诸暨何文庆率领的莲蓬党、余姚十八局先锋黄来昌等部攻入上虞县城（丰惠），斩了知县胡尧戴。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潜伏的十八局农民军配合太平军攻克余姚城，知县陶云升逃往宁波。恶霸地主邵元照在逃走时被群众截获，投于姚江淹死。十八局农民军在黄来昌率领下随太平军入城，号召十八局成员协助太平军守护姚城。当时，太平军首领赓天义、阮士珍驻守在余姚城。龙泉山上黄旗招展，各处均有太平军防守，严查人员来往。太平军攻克余姚后，编设乡官，有监军、军师、旅帅、司马、卒长等名目。户立门牌，新政设施，收罗进贡物品，令民蓄头发，居民不敢随意走动。余姚民间称太平军为“长毛”。各村农民相约参加太平军，仅安山桥一村就有70%的青壮年参加。

此后，太平军继续东进。范汝增派遣部属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攻占奉化，何文庆率领莲蓬党等部于二十六日（28日）占领慈溪（现慈城），知县牟温典逃往宁波。十月二十七日（11月29日），在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代表有雅芝来余姚谒见黄呈忠，商讨太平军进宁波后保护外侨事项。黄呈忠提出以不助清军为约，准其所请。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在余姚十八局先锋黄来昌与诸暨莲蓬党首领何文庆的配合下，太平军攻克绍兴府城，击毙清知府廖宗元，迫使助守府城的余姚团练武装谢敬“黄头勇”从绍兴退至曹娥江，嗣后与其兄谢端一起逃往上海。至此时，金华、严州、嘉兴、绍兴皆为太平军所有，杭州城极度孤危。

十一月初六日（12月7日），太平军攻克镇海。至此，宁波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初八日（9日），黄呈忠、范汝增所部太平军攻克宁波城。清提督陈世章，宁绍台道台张景渠，知府林钧及流亡在宁波的官员躲入江北岸英国领事馆，后乘法国军舰潜逃上海。十一月上旬，黄呈忠、范汝增所部太平军分别攻克宁波府城及所属各县。至此，宁、绍、台三府所属各县全部被太平军所占。与此同时，侍王李世贤部属又先后攻克天台、临海、黄岩。黄呈忠又派张得胜部由奉化入宁海，攻克象山县城。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余姚十八局义军军师潘世忠和汪炳育率部8000人进驻象山接防。至此，宁、绍、台三府所属各县除舟山外已全部被太平军所占。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部太平军攻克杭州城。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布政使麟趾在逃跑中丧命，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候补道胡元博、朱琦等均被击毙。

至此，太平军已经占据了浙江11府中的9府70个县，李世贤成为浙江几十座城市的主人。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二月，太平军焚掠潮塘、拆落市一带，抢劫张姓等巨户多家。三月，时由鄞县的名人陈政钥指使大岚山大路（石门）人吴芳林（振堂）在章村组织了一支团练武装，当太平军一部从董江进兵大岚时，被吴芳林的团练武装阻击，遭到损失。太平军一路追踪到上虞下管村，杀掉吴芳林。

四月十二日，清军联合英国水师、法国水师、英国人所练的常胜军会攻宁波府城，太平军不支，退出宁波城。十三日（5月11日），戴王黄呈忠退守余姚北城，首王范汝增部从东南陆路退守余姚南城。十四日官军克复奉化。十六日（5月14日）官军克复慈溪（现慈城）。

此时，潜逃上海的余姚团练武装“黄头勇”头目谢敬，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从扬州招募了几千难民后回到余姚，配合清军攻打太平军。

黄呈忠、范汝增率太平军退守余姚以后，在姚江蜀山渡以东江南密布

河桩，构筑工事，阻止官军船只西进。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宁绍台道台张景渠率领“白头勇”和外国兵轮，驾轮西行，拔掉姚江河桩，火轮船行驶至蜀山渡。余姚知县陶云升同第四门谢采璋的“黄头勇”、新昌的孙善松等亦募勇助战。二十四日，官军联合“黄头勇”“白头勇”，进攻余姚城，被太平军战败。时，镇海范维邦率领义勇军驻扎在余姚彭桥，被太平军战败，退走。二十五日，太平军焚掠石堰、横河等乡。

五月初四日（5月31日），提督陈世章率官军再攻余姚，又被太平军击退，陈世章退守丈亭。五月十四日，太平军焚掠浒山、坎镇；在姚城北门杀“白头勇”俘虏，尸体积成三坟，时称“义民丘”。

七月初三日（7月29日）清宁绍台道台张景渠部配合洋将马惇率洋枪队“常胜军”和日意格率洋枪队（称“花勇”），由水陆两路进犯余姚，陆路官军由张其光率领一部进次姜家渡，李光率领一部进次郁家湾。余姚新旧两城，隔江屹立对峙，太平军即于姚江中密排木椿，两岸筑卡，列火炮，以拒官军。

七月初五日，张景渠率部乘船先行进攻，行抵岳庙港外，太平军开炮抵拒。

七月初六日，太平军在黄山桥抵拒官军，旌旗遍野，炮声震耳，中西各军遂分南北两岸进攻，太平军死伤颇多，但官军仍被太平军击退。水路官军乘黑夜拔除姚江木桩，使江路无阻，遂使洋轮驶入岳庙港。

七月初七日（8月2日），中西兵轮驶近城垣，开炮轰城。官军陆路兵列阵竹山顶，太平军大队出东泰门，分两翼迎战，兵临竹山，官军后撤。洋轮随即开炮回击太平军，太平军只得撤回。官军再次开炮轰城，陆路的官军也乘势反扑。江南新城遂被官军攻占。

七月初八日（8月3日），官军联合英水师、法水师、常胜军、常捷军等，继续进攻江北旧城。经过激战，太平军战败，撤出姚城。黄呈忠部退守上虞，范汝增和何文庆退守姚西方桥、马渚一带。太平军撤离余姚县城之后，知县陶云升和道台张景渠进驻姚城。宁绍台道台史致谔莅任，张景

渠晋升观察使。

官军对凡参加十八局的农夫进行捕杀，据传被杀十八局农民的头颅是用箩担挑进城的。

八月十二日（9月5日），太平军黄呈忠部从上虞、嵊县回攻余姚县境，被官军击退。

八月十八日（9月11日），太平军万余人自上虞回军攻打余姚城，清军护理提督陈世章等督率各军以及英法两国兵轮，合力抵拒，打退太平军。

“黄头勇”首领谢敬在上海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谕以及江苏巡抚李鸿章谕，到扬州募得兵勇，遂于是年七月十四日回姚，屯兵于第四堡，阻扼塘路要冲，连营20余座，与姚城互为犄角之势，遂乘机率“黄头勇”截杀太平军，斩获太平军战士极多。

事后，太平军遂分兵为三，一部屯余姚境内；一部绕小路径犯慈溪；一部犯奉化陈公岭，有军兵2万多。

八月二十五日（9月18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慈溪（慈城）。宁绍台道台史致谔急令中西兵船进剿，提督陈世章亦令谢采璋率部忠义军，与外国将领税务司日意格，筹派法国兵勇驰往策应，复令各军坚守余姚城。史致谔自率小队官军回宁波守御。

八月二十七日（9月20日）英国舰长波格乐联合华尔率领的美国常胜军进攻慈溪，首次进攻由华尔带队370人冒死进城，至狭巷被太平军击退，生还70余人，华尔被城上鸟铳击中胸部受伤，急送回船，于次日死。而部下已登城，慈溪再为官军所占有。闰八月初三日（9月26日），戴王黄呈忠由慈溪败退余姚境。

太平军攻占奉化后，被史致谔、陈世章、游击布兴有及鄞县各乡民团，约会日意格等，同时拨队进剿，至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官军占有奉化城。太平军残部遁隐余姚北乡。

余姚城被官军克复后，七月、八月、闰八月、九月，先后4个月间，除东门黄山桥之外，其余西、北、南三门被太平军日夜围攻，岌岌可危。

九月初七日（10月29日），谢敬率军驻营于马渚。太平军中的十八局农民军闻知谢敬率领“黄头勇”驻守在马渚，他们与何文庆部配合，由黄来昌率领，于九月十三日（11月4日）围攻在马渚的“黄头勇”。由于谢敬与十八局农民军积怨极深，农民在积愤之下，将谢敬用棉花裹身浇油烧死，名为“点大蜡烛”。谢敬死后，常胜军、“黄头勇”余部由谢氏族入谢国恩、谢采璋以及周景富等，随同官军仍与太平军、十八局为敌。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8日），官军联合英法常捷军、常安军、定胜军等打退太平军，太平军黄呈忠率部从梁弄败走上虞。范汝增、何文庆率部仍驻守方桥、马渚一带。

自后，太平军及各部窜扰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之北乡，张景渠观察使与提督陈世章、法国副将勒伯勒东部署中西各军，于九月二十七日（11月18日）直捣上虞。太平军沿途所结兵卡、帐棚14处全被攻夺，太平军将士被杀无数。九月三十日（11月21日），官军兵临上虞城下，以火炮攻城。太平军将士奋战抵御，击伤洋将日意格手臂，最后太平军因力不支，遂渡曹娥江西撤。冬十月初一日（11月22日）官军占领上虞（丰惠）县城，太平军败走绍兴。

同治二年正月廿六日（1863年3月15日），观察使张景渠率官军，联合洋将率领的常捷军、常安军、定胜军，进攻绍兴府城，太平军部将杨应柯开城叛附，绍兴城被克复。左宗棠部官军亦于同治二年（1863）年初，仅用3天就攻占龙游、汤溪、兰溪、金华四城。至此，李世贤部太平军在浙江的地盘尽失，只好退守到苏南的溧阳。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左宗棠率官军克复杭州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督率官军克复天京（南京）。

辛亥革命与余姚光复

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9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选举产生各省咨议局，中央组成资政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余姚竹山港的饥民千余人，“将厘局房舍及附近之土药局全捣毁”（《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

余姚人马宗汉（1884—1907），在辛亥年之前4年的安庆起义中为近代革命献出了生命。马宗汉与陈伯平经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后转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从日本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马宗汉、徐锡麟、陈伯平在安庆举义，陈伯平中枪牺牲，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马宗汉被杀时为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907年8月24日），年仅24岁。待辛亥革命成功后，按孙中山指令，将马宗汉与徐锡麟、陈伯平追赠为“三烈士”，忠骸合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

光绪三十四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立宪时间段。慈禧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清宣统三年四月成立皇族内阁（新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由此遂冷了汉人官僚和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的心都凉了，造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继三月由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兴统率的广州起义之后，武昌革命军发动起义，夺得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这就是辛亥革命。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凌晨，辛亥革命终于爆发。在蒋翊武等的指挥下，武昌革命军经过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全城。追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志士仁人，为我们沉睡已久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启蒙洗礼。几千年沿袭的封建皇权受到质疑，并被最终倾覆，这种天翻地

覆的山河巨变，开启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杭州城光复，举汤寿潜为都督（后改为蒋尊簋）。九月十六日，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发布政令，要各府县奉行共和政体。王金发率部赶回绍兴，组织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即时派遣武装小队到余姚，支持余姚的光复事件。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余姚县城“光复”，城内各界悬白旗志庆，上书“光复大汉”。知县主动交出大印，让位出走，由乡绅邵芝舫暂摄县政。邵芝舫是邵老五之子，邵灿之侄。不几天，有一姓胡女性，自称革命党，来姚接收政权。士绅们一边设宴招待，一边去省府探明情由。后来接省府回复称：“省里从未派人来姚。”胡姓女子原是假革命，邵芝舫急叫来一个杀猪的屠夫，叫他来杀胡姓女子。假革命女子跪地求饶。后来鉴于胡姓女子虽然假冒革命，但对余姚并未造成危害，也没有作恶，邵芝舫就将她饶放逃生。

时有绍兴军政分府总督王金发派遣新兵头目王国治率武装小队百余人路过余姚，被余姚士绅留住，驻守县学宫，王国治住县衙东侧都司衙门。在县衙门口放置两门大炮，姚城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中华民国元年（1912）1月，废除府制，成立余姚县公署，设民事长陈时夏总领县政。民事长到任，邵芝舫即交印。2月，列余姚为一等县。

省政府公布《浙江省县自治章程议决案》，令各县执行。要求民众剪辫；禁止缠足；保护农民，劝农耕作；不准刑讯，焚毁刑具；废除“老爷”“大人”等称呼。

余姚县政府即时执行省政府命令，全体警察手执剪刀上街巡查、剪辫。县衙门前、虞宦街口、通济桥头、南门头等处，均有警察设岗剪辫。由于观念之顽固，不少民众被强行剪辫后大哭大号；有机灵者路遇警察，急忙盘起辫子而逃；时隔数天，乡村民众因不愿剪掉辫子，不敢进城，城区街市显得极为空荡。

中华民国元年（1912）10月，民事长改称县知事，委任王瑞堂为县知

事，吴暎白任县参事。是年年底，陈国材任县知事。

省政府规定：男子统一剪辫，限年内完成。但实际上，山区民众以及边远小村百姓，有不少上了年纪的男人，一直自行保存着留辫的风俗，难以改变，依然是拖着一条辫子进棺材的。

剪辫如此，放足更是困难重重。放足运动即天足运动，“天足”，就是自然、天生的脚，天足运动就是提倡不缠足的活动，主张解放妇女的小脚。

民国二年，余姚县知事吴国恩见余姚女子的解放小脚之举力度不大，为解决民众的观念问题，推进余姚的天足运动，遂选定日子，召集全城民众到城隍庙，召开大会。并将豪门富户夫人、小姐用轿子抬到城隍庙。先由县知事站在戏台上进行动员，宣讲、解说了省政府的决议，大讲放足的好处。然后即将富户夫人、小姐请到戏台上，县知事亲自上前伸手解掉了台上几个女子的裹脚布。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叫声，也不乏故意起哄的怪叫声。待台上几位女子全解掉了裹脚布之后，大会结束，重新叫轿夫将豪门富户夫人、小姐用轿子抬回各自家中。

但是，缠足习俗流传了千余年之久，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放裹脚布的做法，令有的人一时难以接受。据说有一被抬上城隍庙戏台的富家妇女因当众被解掉裹脚布，把一双隐私极深的小脚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感到极度耻辱，当被轿夫抬回家中后，随即上吊自尽了。省府获悉这一信息后，即将吴国恩撤职查办。